



《记忆》八十五期

目录

【专稿】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一）

【评论】

顾 土 榜样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一

余汝信 吴法宪 1971 年 4 月 9 日检讨解读

【往事】

廖振旅 我的右派朋友蔡德恭

【序跋】

吴 象 《所思所忆七十年》序一

丁 东 《所思所忆七十年》序二

【访谈】

文 静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三）

【资料】

吴法宪 1971 年 4 月 9 日的检讨（余汝信提供）

最近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以下重要指示（张树有提供）

总理在工代会后对蒯大富同志的个别谈话（张树有提供）

任冬林整理 湖南土改（二）

【来信选登】

- 1、黃葛云谈 84 期余汝信等人的文章
- 2、印红标、吴晞、范建国、郑广斌等人谈 84 期余汝信文
- 3、阎长贵指出方昕口述中的两处误记

【专稿】

按：此文系复旦大学向前先生的博士论文（2010年4月13日通过答辩）。全文近18万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史实与记忆：以湖南文革为中心（1966—1969）”，第二部分“剖析与研究：群众的行为与动机”，第三部分“理论与总结”。这里发表的是此文的导论，余下部分，将有选择地陆续刊发。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一）

向 前

导论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作了类似政治遗嘱的谈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¹走到生命尽头的毛泽东言语间有几分遗憾、几分无奈，也有几分忧虑。

回想1966年10月天安门城楼上，他斩钉截铁地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²言辞何等决绝，态度何等坚定。十年之前，他信心十足地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十年之后，他终于无奈地叹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十年，他本人也已风烛残年，回首一生将此作为自己平生两件事之一，足见文革在其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¹ 马齐彬，陈文斌.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409.

² 王力. 王力反思录[M].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421.

两件事情，前者到今天仍未完结，后者却在毛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了——1976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定格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即将《五一六通知》和“粉碎四人帮”作为文革开始和结束的标志。然而，虽已盖棺却并未最终定论，争论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的研究主题和百姓的谈资。

毛泽东仍然在天安门城楼凝视着空旷的广场，他的遗体躺在广场南面的纪念堂。每当人们受到压制并感到绝望，每当维权或抗议被视为非法，文革的幽灵就可能化为一种希望，再次召唤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当下岗工人扛着巨幅毛泽东画像，堵住工厂大门的时候；当人们认为当今也需要“继续革命”药方的时候；当80后、90后部分青年人对“大民主”心神向往的时候，“怀念文革”的情绪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暗流。文革，虽然已经远去，但是我们不应淡忘。

一、相关研究述评

1、通史类著作

国内比较早的文革通史著作有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⁴和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⁵；后有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⁶和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⁷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力求“探讨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本身的规律性，寻找出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动乱以新的形式产生的原则和方法”。⁸全书分三篇：第一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第二篇“林彪的崛起和覆灭”；第三篇“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简而言之，该书是从毛泽东与三个人的关系角度来阐述整个文革的历史过程——第一篇主要内容围绕毛刘关系，第

³ 《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见宋永毅.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以下简称《文革文库》。

⁴ 高皋，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该书1996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⁵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该书于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

⁶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⁷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该书于2005年由原出版社推出增订新版。

⁸ 高皋，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2-3.

二篇是毛林关系，第三篇是毛江关系。从具体内容而言，该书没有实现作者的意图——对原因探讨很少，事实描述的工作也不完备。所以，王年一评价说：“一部文化大革命史本来应该系统地说明左倾错误的形成、发展、危害、教训等等，”但这本书“在这方面有严重的欠缺”，⁹“有不少缺点，比较粗糙”。¹⁰

金春明发表过几十篇相关文章和小册子，《“文化大革命”史稿》是其思考研究成果的总汇。全书分五篇，分别是山雨欲来（文革之前），狂风折梁（文革初期），欲罢难休（文革中期），风波又起（文革后期），余波难平（文革之后），研究时段不局限于1966——1976年，而以50年代农业合作化、八大起笔，以80年代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决议》彻底否定文革收笔，时间跨度为30年。该书从探索社会矛盾的角度，尝试把文革放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有助于把握文革的前因后果。《史稿》在文革起因的分析方面具有贡献，总结了导致文革产生的三个恶性循环——“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¹¹这一分析为从整体把握文革的原因作出尝试。此外，该书在问题阐述和史实评价方面不时体现出作者思想上的个性，在大陆文革研究领域尤为可贵。书中没有遵循其他一些论著把文革的全部或主要罪过归咎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简单做法，在许多问题上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读者表明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乃至文革本身，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和决定是无法进行或无法出现的。比如，在谈到文革发动过程时，该书写道：“打倒罗瑞卿是林彪同毛泽东的一笔政治交易。”¹²

但该书对文革本身的书写，尤其是1967——1968年的情况描述却显得不足。唐少杰批评说：“史稿对1967年初春至1968年底的文革众多重大事件轻笔而过，对在此期间的许多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群众派别斗争和全国性的诸多群众思潮忽略不计。”¹³文革的问题离不开群众问题，必须正视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地位和意义，确定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否则，文革作为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与或置身于其中的运动就无从谈起。对文革中的群众问题重视不够，评说不足，特别是对1967年到1968年状况的评述显得薄弱甚至留有空白，不能不说这是史稿

⁹ 王年一.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A]. 见张化，苏采青. 回首文革[M]. 北京：中共党史，2000：559.

¹⁰ 王年一. 我和《大动乱的年代》[J]. 党史博览，2005(9)：53.

¹¹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38.

¹²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55.

¹³ 唐少杰. 《“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J]. 开放时代，1998(6)：108-111.

最大的缺陷。

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被认为是一部进入理论思维的史学著作。该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较为简略，作者力求把读者带到理性分析、冷静审视的境界。该书大致承袭了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提出的“三个恶性循环论”，提出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卷入文革的原因有四：一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二是50年代后期在党内滋长的“左”倾思想对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广泛影响；三是政治思想上的强大压力，运动中人们被迫选择表明态度作出抉择；四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¹⁴

张化对该书的“三个恶性循环论”和“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观点表示赞成，且对“三个恶性循环”提出了修正和深化的建议。¹⁵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书名为简史应该着重叙史，但本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过于简略，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叙述缺乏足够的史料。另外，还有学者指出《简史》过于注重政治运动或上层政治活动的介绍，而对社会层面、群众层面观照不够，应该对群众心理、群众活动、社会政策、制度沿革等领域的研究分析。¹⁶唐少杰对该书评论说：“简史忽略或回避了人民群众的内在的需要、要求和利益（如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以及人民群众活动的自发性、自主性等问题，亦即很容易把文革中的人民群众看成是完全被动的、盲目的。如同过去一些关于文革研究的论著那样，简史没有给予文革中的群众问题充分的、全面的、切实的论述和评价，群众问题所占的篇幅可谓微乎其微。这不能不说这是简史一书的最大不足。”¹⁷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最实际、最深切的生活和感受等被很多论著置于可有可无或忽略不计的地位是不合适的。

之所以将《大动乱的年代》放在最后评述，不是出版时间晚于上述几本著作，而是因为从整体水平上来看，上述著作没有超出1988年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

¹⁴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67-368. 又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319-322.

¹⁵ 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J]. 中共党史研究,1998(2): 78-85.

¹⁶ 张保军.《“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述要[J]. 中共党史研究, 1996(6): 91-92.

¹⁷ 唐少杰. 关于《“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一点看法》[J]. 社会科学论坛, 1999(z2): 108-111.

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叙述1966年5月——1969年4月期间的事件；第二篇“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书写1969年——1973年8月的历史；第三篇“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讲述1973年——1976年10月的过程。该书对文革中的事件及其细节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对于一些群众组织及其活动也有论及（很多问题前几本著作均未涉及）。王年一先生是文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本《大动乱的年代》是目前最权威的文革通史，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以至于麦克法夸尔在2009年仍然说：“在我看来最好的中文文革著作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¹⁸当然，因现实环境的困扰和作者当时认识的局限，这本著作也有种种缺陷。作者后来曾经说：“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旧作，字数不少，发现有不少缺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联动’的错误，当时我就没有认识到。”¹⁹不可否认，该书大大拓展了文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卓越的贡献有目共睹。²⁰

另外，在各种中国人民共和国通史著作中，对文化大革命多有专章论述。郑谦、张化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也是一本文革通史，记述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该书具体翔实地记载了诸多细节问题，如辟出小节来谈“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等问题。²¹其他著作还有红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中有《内乱骤起（1965——1969）》、《风云激荡（1969——1973）》、《极左哀秋（1973——1976）》将1966——1976年的十年历史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记述。²²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三卷《十年风雨（1966——1976）》收录了多位学者文章，以专题形式对文革的发动、红卫兵运动、“三支两军”等问题有精彩论述。²³

大陆之外的学者也有不少文革通史著作。文革期间，中国与世界隔绝，但世

¹⁸ 李宗陶. 1979 中国真正的解放——专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J]. 南方人物周刊. 2009年7月3日.

¹⁹ 王年一. 《王年一文集》自序. (未刊稿), 2006年5月7日.

²⁰ 王年一先生曾打算对《大动乱的年代》进行修改，但觉得“实在不好改，二十年来，新资料出现很多，新观点层出不穷，要修改只好复写了，这又是我现在的身体所不允许的。”见：王年一. 王年一致舒云信. (未刊稿), 2006年6月8日。所以，《大动乱的年代》再版时，王先生只是重写了一篇序，原书未大改。该书已有英译本，尚未出版。2007年9月13日，王年一先生于北京病逝，享年75岁。

²¹ 郑谦，张化.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²² 王志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内乱骤起(1965——1969) [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刘炼.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风云激荡(1969——1973) [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张丽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极左哀秋(1973——1976) [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

²³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 [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4.

界并未忘记中国。文革爆发后，西方学者注意到这一不同寻常的政治运动，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并陆续有文章面世。美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也密切注视中国的动向，开展了持续的情报收集工作。²⁴然而，当时连身在其中的中共党内高层领导都因为不理解而跟不上形势，更加不用说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外国学者了。

但有部分学者显示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惊人的洞察力，研究成果一问世即引起广泛关注。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²⁵从1968年将文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题材。1974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1956—1957年》；1983年，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高层在1961—1966年的严重分歧。²⁶三卷文革起源的专著奠定了麦克法夸尔在文革研究领域领军人物的地位。²⁷

邹谠（Tang, Tsou）在《文化大革命和后毛时代的改革》（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书中运用政治科学的多种方法——包括系统分析法和理性选择理论——以政治科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事件。该书第一章题为“革命、重建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危机”尝试建立起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二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政治系统”体现出鲜明的系统分析风格，认为文革的根源在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和变化的社会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第三章“中共党内派系政治”考察了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分歧。²⁸其余各章在文革研究的基础上对后毛时代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的来看，作者侧重讨论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他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影响20世纪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唯一因素。为支持这个观点，他不仅考察了意识形态，而且考察了历史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权类型与组织机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同阶段及其他一些因素。

²⁴ 王朝晖.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 [D].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5.

²⁵ Roderick Macfarquhar 中文名为马若德，因大陆学界普遍采用其音译名麦克法夸尔，本文为求一致，下文均采用后者。

²⁶ 丁学良. 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A]. 见：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 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 xvii

²⁷ 麦克法夸尔三卷“文革前史”的前两卷有中文版。[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1956—1957)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1958—1960)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三卷中文版尚未出版。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7-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⁸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p.94.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是海外文革通史中的高水平著作。该书第二至五章用精炼的语言记录了文革的过程，还另辟专章分析了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第一章），文革期间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第六章）、教育（第七章）、文艺创作与政治（第八章），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第九章）、城市生活（第十章）、文学（第十一章）。该书的资料来源极其广泛，有效地借鉴吸收了6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对文革过程的叙述篇幅不够。

²⁹ 2006年，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出版，该书弥补了剑桥史的不足，对文革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³⁰ 此书涵盖了文革历史的整个过程，囊括了文革的各个阶段，具体地凸显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主线。此书不仅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以鲜活的话语和真实的记述从不同的角度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此书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几个空白，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清查5·16”的揭露和概述。³¹ 全书注释共1900多条，几乎所有的资料都经过了严谨的考证并列出了来源。³²

2008年，港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先后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六卷。该套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1981年，大致为一卷涵盖三年时间。阅读了最先出版的三卷后，陈永发评价说：“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余英时说：“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³³ 十卷国史中，直接涉及文革为第六卷卜伟华所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第七卷高华著《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

²⁹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³⁰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该书有中文简体和繁体两个版本，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 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

³¹ 唐少杰.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简介. (未刊稿), 2009年9月18日.

³² 该书引用《大动乱的年代》及其修改稿80多次，是全部参考文献中引用最多的，可见《大动乱的年代》对本书的影响之大。同时，该书透露《大动乱的年代》有修改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有其手稿复印件。

³³ 《他们为共和国修信史》，《亚洲周刊》，2008年10月7日。

(1969——1971)》(尚未出版),³⁴第八卷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³⁵卜伟华在第六卷中,针对过去国内文革研究著作和论文粗疏、大而化之的缺点,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不回避,不省略,不跳过,娓娓道来,处处使人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的印象。³⁶第六、七、八卷国史可构成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文革通史,标志着反思和研究文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已有的文革著述相比,国史在史料整理、史实考证、史识方法和观念批判等等方面都有新的、质的飞跃,为结束“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局面迈出了扎实而可喜的一步。³⁷

通史著作之外,还有一些研究文集值得关注。1996年,“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文革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由杨建利主持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推出文革研究专题,由刘庆峰主编出版了《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³⁸2002年,由宋永毅主编,石之瑜、丁抒、王友琴等参与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在香港出版,收录的文字材料达一万多篇,共计三千多万字。³⁹2006年5月,“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纽约举行,会后由宋永毅主编出版了《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该书收录论文50余篇,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⁴⁰

2 专题类研究

最先将文革作为研究对象的无疑是国外学者。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就有关于文革的文章发表。之后,随着文革的影响越

³⁴ 高华先生因病在2009年动了大手术,遵医嘱不能过劳,遂退出写作。

³⁵ 卜伟华. 碾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 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史云, 李丹慧.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 [M]. 香港: 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³⁶ 王年一. 序言: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A]. 见: 卜伟华. 碾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M]. 香港: 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xxi.

³⁷ 唐少杰. 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大进步. (未刊稿), 2008年12月14日.

³⁸ 刘青峰. 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³⁹ 宋永毅.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 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 该光盘于2006年发行第二版。目前,第三版文库正在编辑中。

⁴⁰ 宋永毅. 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M]. 香港: 田园书屋, 2006.

来越大，更多的学者对此倾注了研究的热情。麦克法夸尔、费正清、沈迈克等成为文革研究的佼佼者。国内的文革研究起源于80年代。以高皋、王年一、金春明等人的通史类著作为代表。直到今天，学者谈起文革，仍不免有“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的慨叹。

文革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视角的分野，一是关注上层政治精英，一是侧重普通群众的研究。西方学者最初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出版的各种小报，研究的兴奋点在于权力斗争——高层政治精英的清洗和升迁。对政治精英博弈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了文革研究的主流。伯雷汉（Philip Bridgman）在《中国季刊》上的系列文章均是对毛的关注，如《毛的文革：起源和发展》（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1967年毛的文革：夺权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7: 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毛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等。黄靖从党内派系角度分析政策变动。他认为建政之前，党内派系在各自孤立的区域发展，使得各山头与下属拥有密切的关系网络；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既存的关系网络转化成派系。基于此，他把党内派系作为自变量，解释派系如何影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和决策过程。

研究要重视普通群众的观点之所以盛行，与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变化密切相关。60—70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社会史、地方史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的年鉴派、社会科学派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官方史学”不再是史学关注的焦点，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开始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关注。反映在文革研究领域，很多学者放弃宏观的叙事结构，从个案入手，对某地区或单位的文革进行了观察和剖析，取得了丰硕成果。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注意力转向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和冲突。除进一步收集文革期间各种出版物资料外，学者们对离开大陆的中国人做了大量采访积累了可靠、可贵的资料。遵循关注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和分析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思路，形成了解释文革的“社会冲突论”。

最早分析群众分裂对立原因的是韩裔美籍学者李鸿永（Hong Yong Lee）。他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文革期间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二者的基本区别是对

运动的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一派攻击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他指出，激进的群众组织主要由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而保守分子主要来自优裕的社会集团。

陈佩华、罗森、安德佳对原广州的红卫兵作了长时间的采访，发表文章对李鸿永的观点提出修正，揭示了学生红卫兵派性之后的社会冲突。《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anton>)一文认为学生的冲突来源于几个方面：第一是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学生向上的前途并不宽阔；第二是学生升学的压力增大导致学生竞争加剧；第三是竞争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的矛盾。最后，阶级背景的对立在文革中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陈佩华、罗森、安德佳三位后来分表发表专著，对上述观点作了更详尽的阐述和发挥。对群众的重视、视角向下的思路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社会冲突论”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对于群众的专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1) 红卫兵运动研究

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研究最初几乎全部集中在对红卫兵的研究。因为文革的蔓延与红卫兵具有直接关系，所以红卫兵一直是专题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前文提到的李鸿永等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红卫兵运动。陈佩华、罗森、安德佳的《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anton>)一文是红卫兵运动研究的高水平文章。此后，西方学者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趣长盛不衰。

大陆学界对红卫兵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有朱世雄《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悲剧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建华《红卫兵：一个社会结构分析》(《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2期)、刘青峰《民族主义和超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等。这些论著具有拓荒意义，但是绝大多数都侧重于抽象的理论论述和定性分析，而疏于相关史料的发掘运用，观点和结论显得笼统空泛。有的论著虽然有一些简单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要么完全基于论述这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感受，要么完全基于当时报刊资料和领导人讲话的字面解

读，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和派性斗争问题时带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大致理清了红卫兵的派别和差异。他认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老红卫兵是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保守派红卫兵是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造反派红卫兵是最高领袖指挥的平民子女造反者；极左派是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他们在斗争方向和社会背景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显现出各自的政治特点和行为倾向。在四个主要政治流派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充当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流派。印的文章其实只是北京红卫兵的划分，所以突出强调了老红卫兵，并认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成为运动中的主要派别。在北京之外，很多省市的情况是没有单纯的老红卫兵组织，高干子弟都在所谓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中，亦即在北京之外的很多省市，保守派和造反派才是红卫兵组织的主要派别。所以，徐友渔在《“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和《形形色色的造反》等文章和著作中，均认为红卫兵的派别对立首先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保守派失败后，造反派内温和派和激进派严重对立，大武斗发生在造反派内部，派性斗争长久不能解决。

唐少杰在《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文章中考察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产生、演变和派别。叶青充分运用档案文献对福建的红卫兵组织名称、派别、组织特征及演变过程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其他关于红卫兵的著作还有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鲁礼安的《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红卫兵狱中吁天录》、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此外，由于大陆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增加，一些新的观念、视角和方法被引入，以往那种带有过于宏观和抽象的思维方式和叙事结构开始改进，更多的史料得以采集、发掘和运用。徐友渔通过对文献、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在《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一文中对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和红卫兵行为的原因作出阐释。他分别考察了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年学生成长和性格养成的影响，

提出了革命至上、反文化和反文明倾向、斗争哲学、阶级路线、意识形态的限度五个方面的因素。他们投身运动的普遍性因素是青春期激情，在此基础上，老红卫兵对阶级斗争的狂热宣传和推行、党的两种声音、文革发动者的策略手段以及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都是重要原因。这些观点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有更加全面和详尽的表述。同时，该书吸收了陈佩华等“社会冲突论”的成份，对普通群众和社会矛盾均有深入探讨。董国强认为，在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思想意识中，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已经不是文革研究的侧翼或点缀，而是主攻方向之一。

(2) 红卫兵之外的群众组织研究

90年代以后，由于对群众组织研究的越发重视，学者的目光超出红卫兵的范围，把研究对象扩展到学生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对文革中的工人、市民组织均有不少研究，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从而将文革研究引入更深层次。

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中对包括红卫兵组织在内的所有群众组织都有描述，如武汉文革的主力军——“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钢工总”)，“工总”的同盟、武钢及一冶产业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钢九·一三”)，“武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百万雄师”等等。经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心中的领袖形象不同，由此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运动中的人们对毛指示的解释并不真正关心其“本来的”或“真正的”含义，他们的解释实际上是个人背景、愿望和需求的产物。王芳在文献资料基础上，围绕普通工人为何及如何参加武汉“钢工总”，以及“钢工总”组织如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口述历史调查。《记忆中的底层文革——关于文革时期武汉“钢工总”的口述历史研究》一文阐述了“钢工总”的产生和崛起过程，分析了组织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造反动机，理清了“钢工总”与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剖析了“钢工总”内部结构，介绍了其章程和制度、财务状况和领导更替情况。

李逊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利用编写《上海工运志》的机会，接触了上海工总司的档案材料，并用心作了收集和记录，写了《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

兴亡史》一书。该书主要以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造反史为线索，用3/5的篇幅详细记述了1967年8月4日“踏平联司”之前“工总司”的崛起和发展。该书资料丰富，许多分析颇有见地。李逊与裴宜理合作完成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1997年出版，是又一本关于上海文革的专著。全书共七章，主要研究文革时期上海的群众组织——工总司、赤卫队、红卫兵、闹“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以及写作组等的活动情况及其特点，对一些重要人物如王洪文、潘国平、王秀珍、耿金章、等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也专门讨论了一些重要事件如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上海“人民公社”事件等。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研究解放前上海工人运动后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打通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观察到了工人状况的延续和变化，认为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其它城市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工人作用和角色，上海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同的社会取向——造反派向党的权力要权，保守派相反，闹“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公正待遇。她认为很特殊的情况在于，当军队在全国对群众组织已经取得控制权时，上海的核心政治权力仍由造反派控制，上海的造反派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激进派的社会基础。

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一书详细记录广州造反派组织“红旗派”和保守派组织“东风派”在1966——1968年间的争斗全过程。该书深入群众组织内部，分析了组织成员的构成，指出广东省的文革运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广州重工业少，工厂规模有限，60年代的工人中，其父辈也是工人的很少，他们的家庭出身多是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职员、技术人士等，因此在造反派中其非红非黑人数最为强大，这也是文革期间大中城市造反派能居优势的原因之一。该书还注意到“红旗派”里有一部分是支青队伍，他们加入红旗派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借助造反回城就业。作者还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认为正是不同层次的诉求导致了“红旗派”内部的分歧。

叶青认为福建群众组织的对立与演化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统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方面，是与整个文革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的。群众组织间对立与演变，即某个组织合与分、分与合、分分合合都是错综复杂的，诸如中央政治气候

的变动、各个组织（人群或阶层）素质、历史因素、现实利益、文革本身、本地区特点，等等，甚至是诸因素兼而有之。赖正维在《“文革”时期的农民“造反”组织及其活动管窥——以福建为个案的分析》一文对文革时期福建农民组织的建立、活动和影响有所描述。文章认为，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的建立与红卫兵大串联有关；大多组织庞大，分工细致，设置严密；组织成员的行为动机主要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但不可否认也夹杂着诸多的其他因素。金大陆对上海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群众报刊等“宣传品”的种类、出版情况、发行渠道作了详实的记述和分析，对研究上海文革中的群众具有独特的价值。

（3）文革与社会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

林怀特（Lynn T. White）的《政策混乱：文化大革命中暴力现象的组织原因》（Policies of Chaos: Administrative Causes of Viole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将1949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镇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夺权、武斗等历史事件和工人、学生、市民、干部等多个社会群体在各个阶段的反应；认为文革是先前已存在的社会情形的自然继续，根源于极权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制度，文革中的混乱和暴力是中国社会矛盾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三种来源分别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使人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单位中群众和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使得暴力合法化。

印红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一文中考察了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知识分子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第二位的任务。这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带有社会性的矛盾即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第二，群众运动与社会矛盾。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植根于现实的、

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积聚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1957年整风鸣放、1963至1966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的情况。第三，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文革期间，群众与领导层的社会性矛盾被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但干群关系远没有尖锐到导致政治运动的地步。所以一般群众不满领导的官僚主义压抑、特殊化、特权等弊病，又真诚地对领袖、对执政党寄予希望，在思想上易于接受以旧制度阶级关系解释新制度社会矛盾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释新制度下的社会矛盾。另外，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群众相信毛泽东的正确性，习惯于在他的思想框架内寻求扫除社会不公正，创造理想未来的出路。

王绍光认为是探寻平等和追求发展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给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内部政治的动力，并产生了最终导致文革的典型特性和压力。这个矛盾在三个层次上展开——错综复杂的政策侧重点的变换，领导层的分化和无所不在的社会冲突。他指出，作为社会的两个组织原则，精英统治和平均主义取向各有其特殊的组织目标，各有不同的手段，并有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任何政策上的转变必将使一些人感到满意而同时加重另一些人的不满。政策倾向上侧重点的复杂变化，使不同利益的社会团体感到他们彼此总是处于对抗之中。对于地位、权力和稀有资源的估价或要求，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文革前的中国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分化，精英与群众间的垂直冲突，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在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冲突导致了紧张、失意、缺乏安全感和不满情绪的增长。没有一种使紧张得以放松的机制，就有可能来一场大爆炸。

李逊与裴宜理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对上海出现的“经济主义”浪潮有细致研究，所得的结论与王绍光的看法有一定契合。“工总司”也就是造反派，“赤卫队”是保守派，另外还有一派叫做“经济主义风”。这三部分工人运动具有很大差别，特别是他们的斗争目标不一样——“工总司”的造反派主要目标是为了推翻掌权者，保守派的“赤卫队”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掌权者，“经济主义风”这一派主要是为了改变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前两者具有政治目标，第三派“经济主义风”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主要是一些合同制工、临时工等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

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产业工人直接指向了经济利益。部分学徒工反对学徒期延长，到主管单位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各单位职工找种种理由要求发放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等等。可以看到，裴宜理特别注意运动参加者群体间的区别。

（4）政治文化、群众心理和社会思潮

陈佩华的专著《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ly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最早尝试揭示文革前个人政治社会化过程。该书通过对 11 个人的深度访谈，选取四个代表人物，划分为顺从的、有纯正癖的、反抗的、讲求实际的四种积极分子类型，考察了他们小学时期的政治教育与性格形成的关系、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和文革中后期的变化，讨论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他认为新中国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国家对价值观形成和行为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那些前政治积极分子；家庭在价值观形成方面的作用十分微小，儿童们对党、国家、毛泽东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代替了对家庭的情感取向。同辈群体之间的竞争压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从文化、心理层面进行思考的成果大量出现。唐少杰《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文章指出，红卫兵运动有“造反有理”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结、血统出身情结、道德专政情结、英雄主义情结、理想至上情结等，这些“红卫兵情结”不是形成于文革之际，而是与文革的孕育和发动密切相关；红卫兵的孕育和形成于新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红卫兵情结”为一代红卫兵带来沉重的历史抱负，但是红卫兵运动也是 20 世纪中国青年运动中最大的一次破产或异化。《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也涉及到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思潮论争。

李月军在《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对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的历史渊源（封建政治文化、战时政治文化、文革前新中国政治文化、苏俄政治文

化)、基本内容(阶级斗争理论与意识的核心地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政治文化极度泛化、狂热的个人崇拜等)、主要特征(单一性结构、封闭性、保守性、排异性、“超稳定性”、专制性等)、内在矛盾(反主体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过大、结构性矛盾等),及政治文化对文革产生和发展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一文中,李月军认为文革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法性,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文革起到了强烈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但是由于文革政治文化自身及其所支撑的政治实践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它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有限度的。

王宇英的文章《“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问题研究》选取家庭与政治的互动视角,通过阐释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的形成、表现、特点等基本情况,揭示作为私领域典型代表的家庭与公共政治之间互相依存又不能互相侵入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经济、道德体系的确立,家庭承担了更多的政治任务,阶级原则渗入家庭内部,人们在个人崇拜、从众心理、利益驱动心理、信仰追求心理的综合作用下,加速了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发生。政治运动的强大渗透力一度打破了家庭中层次关系与角色关系的常态。但是,“革命”力量一旦减弱,家庭也就成为最早“复辟”的地方。夏丽娜对文革亲历者进行访谈,研究受访者政治社会化过程与其在文革时期行为之间的关系。该文章指出,受访者们受到了制度性规范和日常生活两种力量的影响。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割裂的社会结构下,制度性规范和日常生活的逻辑的矛盾,造成了个体对信仰权威和生活权威的情感的不一致。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行动者受到了过往经历积聚的情感能量对他们的行为的影响。在文革中采用什么行动,加入什么派别,一方面在于被访者们在文革之前的经历造成他们对生活中权威的情感,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在信仰的权威中寻找到的对行动正当性的依据。对信仰中权威的依赖的情感和对现实中生活权威的情感构成了行动者行动的两种力量。

近年来,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不断有成果出现。

王绍光的《文革中的新思潮》(‘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重点考察了“新思潮”的代表——湖南“省无联”和湖北“北决扬”。“新思潮”的观点认为文革的目标不是改组官僚政治,而是要创造以巴黎公社为模型的新社会。革委会的建立顶多只是一种表面改革,真正重要的是创造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官僚政治和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的生活。这种“新思潮”在文革最初的几个月就已出现，伊林·涤西的公开信是“新思潮”初试啼声。随着时间推移，“新思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尽管从未成为造反势力的主要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的“省无联”和湖北的“北决扬”。他们试图根本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哲学、经济的基础知识，所以只能从经典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纲领——巴黎公社之所以成为他们所推崇的模式，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接近其理想的唯一模式。同时，他们也从未思考过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收集了“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论”、“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省无联思潮”、“北决扬”、“四·一四思潮”、“李一哲思潮”等社会性思潮的原始文本。该书高度评价“出身论”，认为它是追求人权、追求平等权利的杰出代表；而“李一哲思潮”承递了遇罗克关于政治权利平等的追求，并进一步把这一诉求推进到健全法制的新的高度。其次，该书认为“省无联思潮”、“北决扬”是从左的方面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实际的管理权利，形成了独立于官方理论之外的反特权、反官僚的异端体系；“联动思潮”、“四·一四思潮”等则是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作者认为，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异端思潮，都已在文革中汇成了一股挑战与颠覆正统的合力，是文革留下的思想财富之一。

印红标在研究红卫兵的过程中对青年心态、思想和社会思潮等问题有所论述。他与唐灿、米鹤都、陆建华的主题对话梳理了红卫兵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轨迹。几位学者提出红卫兵是文化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结下的一颗苦果，他们率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加以说明，重要因素之一是文革前十七年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熏陶，他们思考所依据的理论是错误的。在文革的各个阶段，红卫兵群体的思想和行为都有转变。最后，他们上山下乡，正式步入社会后由于人生阅历的丰富思想也因此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印红标较早的文章还有《坚冰下的潜流：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思潮》和《抗争者的冲突：遇罗克与联动的论争》等，其在思潮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专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该书对文革十年先后出现在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他青年群体中的一

些或显（如联动思潮、极左派思潮、“新阶级”思潮、李一哲大字报代表的思潮、四五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等）或隐（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或遭到批判从而没有得到传播造成影响）的重要思潮个案都尽可能地搜寻、荟集起来，作了客观的记叙与冷静的评说，对不同时期的重要青年思潮，作了分门别类的发掘和梳理，资料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堪称一部文革十年青年精英政治思潮的“小百科”。

专门研究遇罗克个人的资料有徐友渔等主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和遇罗文的《我家》 等。此外，杨健对文革“地下文学”的研究和徐晓主编的《民间书信》 都从不同侧面对青年思潮有所反映。

（5）个人文革史和地区文革史

文革以后，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之外，大量其他人的自传或回忆录也得以出版。文革一段的经历无疑是这些著述的重头戏。关于陈伯达的回忆类书籍先后有《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成员王力在香港先后出版了《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记事》和《王力反思录》。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原外交部工作人员马继森的回忆录《外交部文革纪实》于200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在北京出版，吴德曾先后任北京市长、市委书记。2005年，《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在上海出版，陈在文革爆发前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合作推出接近回忆录性质的文革研究专著《问史求信集》，对自己所了解的高层人和事的情况有详尽交待。文革“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所著回忆录2009年在香港出版。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将自己的回忆类文章和自传付梓，得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普通人在文革期间的状况。同时，因为普通人的“文革回忆”侧重于个人在文革中经历，所以这些回忆录通常也成为个人视野中的地方文革史。徐友渔的《蓦然回首》即可视作其个人的“文革回忆录”，也可以视为其所观察到的四川文革史。前文提到的一些红卫兵，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是对四川文革情况的反映，作者曾是四

川重庆“重大八·一五战团”的头号理论家，担任过《八·一五战报》的主编。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和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是北京文革史研究的宝贵资料。鲁礼安是“新思潮”中“北决扬”的代表人之一，其回忆录《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红卫兵狱中吁天录》对武汉地区文革和“北决扬”都有详细记叙。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也是武汉文革史的重要资料。吴焱金文革爆发时是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参加造反任武汉“工造总司”勤务员。1967年6月，“7·20事件”前夕任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副总指挥。8月下旬任“新派”联合成立的“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总指挥，后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是武汉文革的风云人物之一。此书从一个青年工人、造反派负责人的角度对武汉文革历史作了详细回忆。另外，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作为武汉文革史专著，其研究方法和视野都有独到之处。

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和陈益南的《青春无痕》既是个人文革史，也是长沙文革史。杨小凯亲历了1966——1968年长沙的各个重大事件，还是“省无联”的骨干成员，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而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点名批判。《牛鬼蛇神录》记录了其在湖南多个看守所、监狱和劳改农场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个人的思想历程。陈益南的《青春无痕》则是一个普通工人在文革中的造反经历记载，对长沙文革的重大事件都有个人的细致观察。丁学良的一些回忆文章对安徽文革史有诸多记载和描述。

近年来，由于网络的普及，很多人的回忆得以在网络空间留存供人传阅。2007年6月，原中共中央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中将生前口述写成的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由其女儿冼玲放上博客公开发表。这是文革时期担任过大军区和省级革命委员会一把手的高级干部中第一部全景再现式的回忆录。书中记叙了作者所了解的甘肃地区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对作者亲历或参与过处理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有争议的事件（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作了详细记叙。

继周孜仁之后，重庆另一位曾任《八·一五战报》主编的黄肇炎也写出了回忆录《沧海一滴》，其中第九章为《文革亲历》，发表于个人博客。原“重大八·一五战团”成员、校广播站工作人员张德昂，先后写出了《文革杂忆》、《文革岁

月》，在其博客上连载。此外，原“重大赤卫军”成员黄昌国的回忆录《文革中我在重庆当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回忆》，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原重庆“反到底”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木森已写成《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何蜀整理），王年一、余汝信分别为其作序。

湖南衡阳退休老干部应山红主编《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一书汇集了多人撰写的衡阳文革史文章。《荣辱浮沉南柯梦》一文详尽介绍了文革时期衡阳群众组织的名称、派别和演变发展情况。《十年天地干戈满，四海苍生痛哭深》一文历数了发生在衡阳的11次大小武斗。《火烧后院，祸起萧墙》一文记载了衡阳地、市党政机关在文革中的情况，尤其难得的是忠实记录了这些机关中的中下层干部中造反活动。该书由应山红先生自费印刷并广赠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以及美国部分大学均纳入馆藏。邵阳退休老干部陆芒的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和张介山的《非常岁月》均记载了邵阳地区文革的重大事件和不同人的遭遇。两书忠实记载了邵阳地区抓“黑杀队”、“刮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反映了文革对基层和农村干部、群众的极大伤害。尤其是对抓“黑杀队”运动的记载，为了解“道县事件”的影响和危害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6）其它主题

不少学者在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成果，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教育革命、文革时期国家制度和机构、文革文艺等等。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青研究的升温，大批知青研究著作和文章出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杜鸿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事典》，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等。研究文革前知青的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邓鹏的《无声的群落》和《无声的群落（续集）》等著作。其他大多是回忆性的文章，散见于各地文史资料和知青回忆录。专门对湖南省文革前知青进行研究的专著尚未出现，已有的两篇文章一是刘布光的《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

是朱钟颐的《20世纪60年代初湖南知青上山下乡评述》。

周全华的论文《“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研究了“教育革命”的缘起，阐述了“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分析了“教育革命”建立的新体制，指出这是对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分裂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人民关系的体制，还继续了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以及文革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教育革命”的最后终结。该论文后修改以出版。同类著作还有程晋宽的《“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教育机会被剥夺的时代，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也是获得受教育权利的时代。高默波著作《高家村：现代中国的农村生活》(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书写了高家村四十年的变迁，对国内外学者的不少既定结论提出了挑战或不同意见。作者对比文革及以后的农村社会变迁情况，提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高家村地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达到最好的黄金时期。与此类似，韩东平英文专著《不为人知的文化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对文革时期山东即墨县的初等教育普及成果作了正面论述。

张志明《“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一文对“革命委员会”这一文革“新生事物”产生的历史条件、表现形态、运作方式和历史行程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文章指出革命委员会经历了由鼎盛、平复和衰亡的历史嬗变过程：在鼎盛时期，它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类似于军事管制的机构；在平复和衰亡时期，它逐渐演变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最终为地方人民政府所取代。其产生除了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与文革前业已形成的体制、政治文化和思想理论中的弊端和错误有深层的社会历史联系。在前文的基础上，张志明出版了《走出迷谷：1965——1979年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一书，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的扩展论述，是国家机构和制度变迁研究的杰出成果。王志嵩《中共中央军委变迁之研究》对中共中央军委的历史变迁有简单梳理，考察了历次军委会改组的人事变动。

【评论】

榜样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一

顾 土



毛泽东的时代是英模辈出的时代，那些被树立起来的英雄模范，其名字经过日复一日地宣扬，一个个响彻云霄，其事迹经过反复灌输，不能不深入全国男女老少极其有限的记忆空间，他们的豪言壮语更成为全社会毋庸质疑的座右铭。那个时代的中小学课本里，英模事迹是重要部分，无论是高度艺术化的典型情景，还是非常人所能吐出的语言，深深印

（作者像） 刻在几代人的心中，最终成为亿万男女长久的思想资源。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沉重脚步，紧跟着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英模产生的频率加速，宣传规模也达到顶峰，学习的热度都在一百以上，连日记，这种隐私性最突出的文字都成了被不断加工修改的公开出版物。文革时期，英模也是文革话语的一种有效表达形式和文革成就的有力显示，在文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诞生和学习的英模与文革的进程密切相联，准确传递出文革发展的思想脉络，其意识形态特征更为鲜明、时代思维模式更为典型、塑造的痕迹更为明显。

文革期间学习的英模有两类，一类是文革期间产生的人物，而另一类则来自于文革之前。文革前出现的英模能够顺利延续为文革期间的榜样具有这样几种特点：一是受到毛泽东题词和表彰，二是以学毛著闻名，三是其英雄表现都是阶级斗争和保卫国家财产的简单结果，以军人和未成年人为主。所有英模都是每个时代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主题的结果，即使没有这样的主题，也会加工改造直至成型。

极端个人崇拜的典范

极端个人崇拜是文革得以顺利发动的主要原因，文革又反过来强力推进了极端个人崇拜，直至空前绝后。而极端个人崇拜的形成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学毛著运动密不可分，正是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最终成为日常铁定行为的学毛

著，才使后来的文革锋芒所向披靡，所有被打倒、清洗的人无不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下遭到社会的唾弃和批判。

学毛著运动首先从军队开始，再推向全国各地，其主要推手是林彪。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1960年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他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号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毛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学毛著应该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学毛著方式：“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由于他的竭力倡导和全军全国各级的极力推动，活学活用、讲用会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理学的普遍说法和形式。发行总数曾经达到50多亿册《毛主席语录》也首先出自军队，再版前言就是林彪的手笔，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但熟记于心，还被谱曲演唱，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一景。

毛泽东时代的英模大多为军人，他们无一不被宣传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从言谈到日记，都被毛著所融化，将毛著所有字句的注解和应用一概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个个都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表率，标准形象就是捧着一本毛著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而毛泽东又不断发出学习解放军的指示，让军人英模的榜样作用更加突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那个时代英模的根本方向和最高理想。对王杰的宣传，按林彪的指示是，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于是，王杰成了活学活用的典型。雷锋刻苦学毛著的几种模样家喻户晓，他也是学毛著的标兵，他认为，“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

“定要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扎根，在我的一切实际行动中开花结果”；刘英俊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吕祥璧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李文忠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

学毛著，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阅读或学习，也远远超过了教徒对宗教经典的

崇敬心理，这种学习无益于思考，更没有多少知识可以获取，而是在其中寻找臣服、膜拜的感受，通过学习再提升臣服、膜拜的水平。在对英模的大规模宣传中可以发现，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几乎是英模们生存的目的。

“昨天我听到一位从北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的同志作报告。他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他们，毛主席的身体很健康，对我们青年一代无比的关怀和爱护……当时我的心高兴得要蹦出来。我想，有一天我能和他一样，见到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该有多好，多幸福啊！可巧，我在昨天晚上作梦就梦见了毛主席……我一定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真正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昨天晚上，领导宣布我代理副班长职务，可是能力不足啊！感到压力不小，自己又无领导能力，又无经验，有些畏缩。感到了困难，我就想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我就找到《关于重庆谈判》一文，在这一文中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毛主席又说：‘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又对照了自己，毛主席不正象对着自己说的吗？”

这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摘抄，是否原文，无从得知，但公布、学习、宣扬这些日记则清晰地表达出，全力推进极端个人崇拜是当时树立英模的主要目的。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产物

阶级立场鲜明、阶级斗争勇敢，是毛时代出现的各类英模的基本标准。他们的产生紧随阶级斗争的时代风向，清晰地表达出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征。在他们身上，让我们看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要素，假如失去了阶级斗争的大背景，其英模主题就会丧失了那个时代的传播意义，如果没有阶级斗争残酷性的社会造势，他们的英模形象也不会显得那么突出高大。那个时期的所有英模，无论原始的，还是塑造的，可以说，几乎都与阶级斗争思想结为因果关系。

文革前的英模形象个个都是苦大仇深，出身在贫苦劳动人民家庭，因为受尽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才热爱毛主席，热爱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反抗过阶级的压迫，与阶级敌人进行过斗争，或因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而牺牲，是描述他们的人生时铁打不变的内容。而进入文革时期，英模们的行为又一律加进了路线斗争，捍卫文革的胜利果实、保卫新成立的革命政权、保护红卫兵小将、反对修正主义一类的内容成为主题。即便缺乏这样的素材，也要在艺术化加工时塞进类似的情节。

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当年家喻户晓，其实，最早发现他们、抢救他们的是牧民哈斯朝禄及其子那仁满都拉，但哈斯朝禄属于“管制分子”，结果在所有的宣传中非但一概抹去，而且还在以后创造的文艺作品里将他演变为反面人物。

蔡永祥，这位“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人物，当年凌晨2时34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他，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的刹那间，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但我们始终不知道阶级敌人是什么人，那个大木头如何会横在铁路之上。

吕祥璧抢救的是学生，当然也可以算红卫兵，李文忠则牺牲在“支左”的岗位上，在门合的优秀事迹中还有坚决反对“大比武”，将“大比武”归为罗瑞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加以抵制。

在毛时代还树立了一大批活着的榜样，他们的所作所为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发展同步，成为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模范，一些人还成为自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或者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比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邢燕子、侯隽、张铁生等等。与生死英模同步被宣传推广的还有一批舞台、银幕和小说里的榜样，他们当中有的是以真人为原型，有些则是依据“三突出”创作原则创造的，不管前者后者，形象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模范，外加一些抗日战争中的智勇双全般的高大亮形象，例如《闪闪的红星》的潘冬子、《海港》的方海珍、《龙江颂》的江水英、《艳阳天》的萧长春、《金光大道》的高大泉、《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沙家浜》的郭建光等，他们的阶级语言、斗争唱词也是全国学习的文化课程。

阶级、革命、斗争、共产主义，都是文革和文革中出现的英模身上的主要标记，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凝练、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对学习英模的定位。失去了这些标记、离开了这些定位，就不再属于那个时代的英模、也不是那个时代学习英模的根本目的。

当年娄盛茂和傅庚辰都写过雷锋颂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和《雷锋，我们的战友》，其实，后者更为抒情，更动听，但前者却成为这种颂歌的代表作，这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直白简易地表达了学习英模的时代要求：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打倒旧英雄 编创新先进

文革是对以往革命和历史的一次彻底否定，尽管其中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但在疯狂的情绪下，难得有人去认真思索文革思维的荒谬性。对待从前的英雄模范，文革的主导者和呼应者们也不例外，一概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个个过滤一遍，似乎只要被捕过，只要和所谓黑线有点牵连，只要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只要是海瑞式的清官，只要是帝王将相，就逃不过一劫。

王孝和，这个名字在我记事时就牢记于心，因为在连环画和电台广播里他是个不断被宣传介绍的烈士，叫“不死的王孝和”，说他是工人阶级杰出代表，曾组织上海工人大罢工，被捕后坚贞不屈，牺牲前还写下三封遗书，死时年仅24岁。可在文革中他成了自首变节分子，受到大规模的揭露和批判，还和刘少奇在白区的投降主义反动路线联系起来。

向秀丽也是我少年时熟悉的名字，她出生在贫困的工人家庭里，9岁就给地主当丫鬟，十一岁就靠做童工过活，饥饿和疾病夺去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生命。1949年以后，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还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2月13日，所在车间因酒精瓶破裂，蔓延起火，她侧身卧地，截住燃烧着的酒精，避免了严重爆炸事故，但自己伤势过重，次年1月15日去世。这样一个极其完整的革命形象，在文革中也被广东红卫兵小报无情揭发，发表专刊《向秀丽事迹真相》，说她是陶铸等人捏造的英雄，揭发文章的标题很醒目：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

时传祥在文革前更是一位全国家喻户晓的掏粪工人、劳动模范，在文革中却和刘少奇挂上了钩，被称为“工贼”、“粪霸”，饱受凌辱，还被赶回老家。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比如瞿秋白、王若飞等人，在文革前的形象是英勇不屈，而文革中都成了叛徒的典型。

文革对旧英雄的否定远远不止于中共的历史，而是将上下五千年都来了个悉数清理，从炎帝、舜帝、大禹到霍去病、包拯、岳飞、海瑞、袁崇焕都被扫荡一净，有的墓被砸烂，有的遗骨被拖出来游街，有的碑匾被捣毁。连抗战名将张自忠都被认定为汉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张自忠路也被改为工农兵东大街。在毛泽东的认可下，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早在文革前就被定性为叛徒，一直批判到文革，还和中共领袖瞿秋白牵扯到一起。

文革前有一批文艺作品，曾经被观众所推崇，《红岩》、《红日》、《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党的女儿》、《风暴》、《燎原》、《冰山上的来客》、《红旗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等，在文革中一概被批判为大毒草，里面树立的英雄人物也成了叛徒、特务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代表。

否定数千年无数旧英雄的同时，新的先进分子和英模也在不断被创造中，没有一个英雄不被拔高，不被改写，不被美化甚至神化，其中还有从头至尾捏造虚构出来的英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就是其一，不仅有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还配有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引发全国的强烈反响和学习热潮。

据报章介绍，刘学保是兰州部队的战士，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他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尤其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定阶级敌人“一定要垂死挣扎”，于是提高警惕，严密监视着林场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67年底的某一天，刘学保发现一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大桥，他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激烈搏斗，终于用自己带来的武器，“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冒烟，眼见就要爆炸，就又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桥下，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刘学保被震

倒在河滩上。当人们闻讯赶来时，刘学保不顾伤痛，高喊“不要管我”，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的事迹还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出版了连环画，他的一段日记也传遍了各地：“失去一只手算什么，还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照样可以向敌人开枪，投手榴弹！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在连环画中，对刘学保负伤后的一段描述流传一时：“手术的第二天，刘学保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个要求是：‘把《毛泽东著作选读》拿来。’第一个行动是：和医护人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刘学保的英雄壮举不但让他当选为“九大”代表，后来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亲切接见”。

可事实是，被“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却是一位老老实本分的林场工人。1967年12月17日晚上，刘学保看到他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他走近一座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猛扑上去，朝他一通乱砍。随后自己跑到桥下，拉响自己带来的引爆雷管，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自编、自导、自演了一曲革命军人勇斗阶级敌人、保卫国家财产的“壮丽的共产主义颂歌”。而那个“阶级敌人”名叫李世白，1949年前曾当过宪兵连副连长，1949年在酒泉参加起义，“文革”初期却沦为林场的“管制”对象。被刘学保残忍地伤害后，他尚未断气，因为被认定是“反革命炸桥罪犯”，所以得不到及时救治，还不断受到“革命群众”的摧残，以致不治。他的一家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而被赶出林场，妻子被红卫兵遣送到甘肃定西的农村，以后四处流浪，不得不与一疯老头结婚；儿子遭诬陷后身陷囹圄，女儿长期过着“黑户”生活。直至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经过调查，李世白一案真相才得以大白。1985年7月，李世白冤屈被昭雪，而刘学保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只是那些造假的帮凶和造假得以盛行的时代却没有得到任何审判和应有的反省。

社会作用和价值判断

杨水才和王国福是文革初期被广泛宣扬的两位英模，一个以“小车不倒只管推”名闻全国，被称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以“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而感动读者。如果他们的事迹完全属实，说他们

是农村生产的劳动模范和优秀领头人并不为过，他们的英年早逝，也的确令人惋惜，但将他们拔高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是用推小车和拉马车这样的比喻，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庸俗化。而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英模都被按上个共产主义的头衔，这种泛滥的称呼、任意的拔高，再加上宣传机器长期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曲解，使中国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一直处于低层次的状态。低质化、庸俗化，大概是文革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

其实，只要小车和马车还是生产工具的社会，对共产主义连想都不必想。但是，正因为不顾生产力水平而只顾精神作用的思维方式，才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因为多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浅薄解读，才会生发出“提前跨入共产主义”的梦呓，让“一大二公”居然成为落后贫困农村的旗帜。在文革中，更成为全面否定商品经济、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思想根源。杨水才的故事曾经进入我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其中有段对话令我一生难忘，当他问一位老师现在正教什么课程时，老师回答是在教从猿到人，他却说，教那些干啥，还不如教教咱毛主席的“老三篇”。30多年前我在河南出差，那里正在开“两会”，一位杨水才的同乡，也是个带领全村大干苦干的村支书，他在会上得意地自夸道：我们那里，如今是大米饭，白面馍，社会主义好生活！我当时就想，这还不如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呢。

杨水才、王国福，还有陈永贵等模范人物的事迹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最大影响，实际是将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等荒唐的想象和硬性实践加以合理化、现实化，是将科学社会主义退化为村社乌托邦。这类村社乌托邦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危害，就是一个或几个村社在特殊环境中实现的目标，换到大多数地方却根本不可能，可短期实现的这种表象又让很多人因此成为信众，硬将这些典型移植过去，导致多数农村更加贫穷落后，还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

几十年中产生的英模人物，塑造和宣传的特点就是与现代的普世价值和常识认同大相径庭，其中未成年人英模最为典型。10来岁的儿童，思想本不成熟，缺乏识别能力，更无力自我保护，可在英模辈出的时代环境里，所有的舆论和教育却在鼓动他们冲上阶级斗争的最前线，接受生与死的考验，用自我献身实现所谓的理想，或者用幼小的生命和心灵去保护物质财产。结果，一出出悲剧发生了，

历史证明，这些悲剧是社会误导和认知扭曲的产物。

文革期间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宣扬的是一个儿童如何手刃仇家，如何放火烧屋，打打杀杀的暴力镜头贯穿始终。时至今日，此片仍在少儿节目里播映，还当作了“爱国主义教材”。另外，文革中非常普及的儿童文艺《放学以后》、《新来的小石柱》、《一只驳壳枪》等，无不以阶级斗争、抓坏人为主题，扭曲了一代少儿的心灵，严重影响了他们未来对世界的认知。类似的文艺作品、类似的灌输，在少儿教育中相当普遍，一直被认为是正面形象，但作为少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最缺少的就是准确的判断力，常常因无知而犯罪犯错，以致身受其害。文革初期，冲上打砸抢第一线的大多是中学生，个个都成了侮辱、迫害的能手，之所以被利用被鼓动被煽惑，就在于缺乏识别能力，盲从盲信，最后又变为残酷政治运动的替罪羊和受害者。

文革甚至文革前，许多奋不顾身保卫国家财产、掩护阶级弟兄的英模，其壮烈事迹的背后实际是一次次重大事故。事故原本应该严肃处理，追究责任人，以儆效尤，但这些事故却被转化为英模诞生的温床，成为自我吹嘘、邀功请赏的资本。这种“变坏事为好事”的活学活用领袖哲学思想的风气长期盛行，让假话、谎话大行其道，以致有人不惜制造事故，放任事故，来树立英雄模范。

一方面，极少数英模在那里大放光彩，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却很低，缺乏公民的基本素养，这是几十年来社会的普遍景致。因为少数英模都被宣传工具拔高为十全十美的人，这种宣传不但使英模的行为高不可攀，而且一旦他们身上的缺陷被发现或者虚假宣传被戳穿后，英模的形象也就土崩瓦解了。其作用常常相反，最终沦落为被嘲弄的对象。还有一种英模尽管被宣传为平凡中的伟大，要求人们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学起，但宣扬的定位却放在了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奋不顾身的奉献精神上，从来没有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为明显的因果关系。其实，维护公共利益的最终就是为了维护私人利益，保护私人利益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只有明确告诉大众，别人的今天或许就是你的明天，今天你帮助别人，别人明天才有可能援助你，人们才不至于将遵守公共秩序、见义勇为都只当作为他人为社会做的好事。

美国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托克威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一再提到。他说：“当社会由少数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统治时，他们喜欢培养人们对义

务的崇高理想，乐于主张忘我是光荣的，认为人应当像上帝那样为善而不图报。这是那时的官方道德原则。”“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美国的道德家决不劝他们的同胞为了表现自己的伟大而牺牲自己，但他们却敢于宣称，这种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都是同样必要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不要求人们发挥伟大的献身精神，只促使人们每天做出小小的牺牲。”“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可以保全其余部分。”

这令我想起了一位朋友的孩子，他是家里的“小霸王”，尽管家长老是教育他不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还用各种榜样故事打动他，但根本不管用。后来移民美国，他的母亲来电话说一件小事已经改变了孩子“唯我独尊”的行为。一天，他拿着一个从日本买来的玩具在外面玩，邻家的孩子走过来想和他一起玩，被他拒绝。不料，这位比他还小的小邻居告诉他，假如明天我有一个玩具你也想玩，我也不给你呢！从此，“小霸王”事事以此为思考的起点，言行逐渐起了变化。

英模需要完整的伦理体系作为支撑才可以发挥作用。中国过去的模范人物，例如二十四孝，其背后是成熟规范的儒家思想伦理；而宗教圣徒是信众的榜样，其背后是悠久精深的宗教伦理。毛时代产生的英模尽管以共产主义道德为背景，但这种道德只是一种想象，基本停留在抽象的描述中，缺少现实的应用根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残酷背景下还可以强行得到话语上的认同和传播，一旦环境宽松，斗争懈怠，就成了过眼云烟。没有强大的伦理体系支撑的英模，其作用几乎为零，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动人的美好故事罢了。几十年来的英模时效性也极强，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几年一过即成历史。如果将时代的意识形态剥离，抽掉了极端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内容，只将一些普世的道德追求保留下来，再追加上今天的认知成果，事实上恰恰否定了英模的历史，也否定了英模的本真面目。

其实，失去了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英模的道德理想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只达到了普通公民的基本水平。结果“洋雷锋”多年来成为社会生活的一景，而这些“洋雷锋”在本国则淹没在汪洋大海里。这也说明，在英模学习的表象下，大众的道德底线相当低，“矮子里面拔将军”才是英模道德的实际水准。

【评论】

吴法宪 1971 年 4 月 9 日检讨解读

余汝信

1970 年 8-9 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最早于 9 月 29 日、叶群于 10 月 12 日各自作了一次书面检讨。延至次年 3 月中，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分别作了书面检讨。4 月 9 日，吴法宪、叶群又分别作了第二次书面检讨。4 月 11 日，毛泽东批示予周恩来而非林彪称：“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4 月 15 日，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和吴、叶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在中央批《吴法宪回忆录》封面）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印发。“九一三事件”后，又于 1972 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与吴、叶的首次书面检讨一并再次印发，并为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翻印，以供批判。

上述书面检讨材料，是从一个侧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 1970 年间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情的原始文本，颇有史料价值。而其中吴法宪 1971 年 4 月 9 日的第二次书面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又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种。



一、《检讨》文本对《吴法宪回忆录》的勘正

《吴法宪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无疑为近年出版的极受文革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著述。未可否认，该部回忆录在诉说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心声的同时，也澄清了一些历史疑团。然而，在追寻历史真相的求索路途上，给予我们最可靠帮助的应该是原始文本而非回忆文本。况且，原始文本更可勘正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回忆文本的失实与偏差。

以下，我们试以《检讨》中涉及 1970 年 8 月 13 日一天内的活动为例，对《回忆录》个别失实与偏差处作些必要的勘正。

1、《回忆录》：“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

继续开会。”“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780-781。下文仅注明页数。）

《检讨》：“去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康生同志召开宪法工作小组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

吴法宪在写回忆录时应未能参阅自己当年的检讨，但在《回忆录》之前早已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均已明确指出这一天为8月13日。这一天对吴来说理应十分重要，不应记错，不知为什么偏偏记错了。

对照《检讨》，《回忆录》同样记错了日期的，还有“八月十五日晚上”，（页783）据《检讨》应为“八月十四日晚”；《回忆录》“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页795）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回忆录》“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页802）据《检讨》应为“八月二十六日黄昏，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谈谈。”

2、**《回忆录》：**“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页781）

《检讨》：“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

根据《检讨》，吴法宪与张春桥有争议的是在序言中写不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后来在宪法修改草案定稿时从序言部分移至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内），而不是《回忆录》所称吴提议在国务院“这一章”（实际上国务院在草案中只是一节而非一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异议的只是张春桥一人而非康生和张春桥两人。

3、**《回忆录》：**“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页781）

《检讨》:“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

根据《检讨》及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张春桥在当时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吴在西南组发言中的说法也仅是“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张在当时提及赫鲁晓夫，吴会气得比发抖更发抖，在发言中不会不大批一通。

4、**《回忆录》:**“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那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页 781）

《检讨》:“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

看过张在两案审判时的表现，我们就会相信《检讨》的说法。张此时只会不动声色，深藏不露，他既不会去反驳吴，也不会急，根据《检讨》，更没有透露他“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

5、**《回忆录》:**“我按照陈伯达的意思，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页 782-783）

《检讨》:“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

这一段，我们要质疑的主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周恩来支持他的坚决态度。根据《检讨》，吴在陈伯达家确实给周恩来打过电话。但：（1）既然争论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周有没有说过“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

写上的”就很值得怀疑；（2）吴说自己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毛将三个副词圈去了，周恩来也忘记了吗？而且，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吗？周在1970年会称邓为“邓小平总书记”且会对别人说邓“很英明”吗？

（3）周恩来“从来没有听到毛说过这样的话”吗？吴在晚年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检讨时已知道，周恩来告诉过他毛是说过类似的话的。

毛接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的时间，是1970年6月11日下午。据新华社电讯，毛与罗客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谈话”，陪同接见和谈话的，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见到这次谈话的全文，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毛在谈话中借批赫鲁晓夫对林彪进行了又一次隐晦的敲打。毛类似谈话记录，按惯例事后都会发至政治局成员。张春桥看出了毛话中有话（所以他才那么有底气），吴法宪没有看出来，但在现场的林、周、陈、康、黄难道也都听不出来吗？周抑或听出来了却另有所图？（所以他在吴法宪打电话当日没有表态而在“九一三事件”后的1971年10月才“指出”来？）

6、《回忆录》：“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页783）

《检讨》：“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据叶群1971年4月9日检讨，吴法宪给她来电话反映的时间也是“八月十三日晚”。

二、《检讨》并无任何涉及“国家主席”的只言片语

《检讨》主要“检讨认错”的，是对张春桥的“错误情绪”与自认为“陷进了陈伯达的圈套”，上了陈伯达的当。

关于张春桥，《检讨》称在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由于平时对张“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提出可以不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序言很反感，后来又听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情绪更加激动，对张进行了“顶驳”，给张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很紧张，会后，将情况向周恩来、黄永胜、叶群作了反映，在九届二中全会8月24日下午西南组发言时，又把矛头对准了张春桥。《检讨》称对不起张，已向张认错道歉，

“由于我主观武断地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影响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同志在庐山犯方向、路线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关于陈伯达，《检讨》称8月13日会后陈“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进行挑拨和煽动”，“总之，我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站到陈伯达反‘九大’路线一边，给陈伯达当了帮凶和义务宣传员”。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陈、吴等与张春桥的矛盾与论争，是庐山会议前夕及庐山会议期间双方斗争焦点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该《检讨》，还是吴的第一次检讨、叶群的两次检讨及黄、李、邱的检讨，都没有任何涉及“国家主席”问题的只言片语。我们不但从《检讨》中看不到在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叶群等在“国家主席”问题上与张春桥等有过争议，而且也可以由此想见“国家主席”问题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也并不是林彪及黄、吴、叶、李、邱的罪名，否则，毛怎么会御批“我已看过，可以了”？“国家主席”问题成为一个罪名，当在“九一三”之后。

首先被利用的，还是吴法宪。吴在1971年10月21日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到四十天就“亲笔交代”称：“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七〇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⁴¹

有了吴的所谓交代，官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罗织罪名：“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⁴²

虽然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声称，关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页788）但令人十

⁴¹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1972年7月。

⁴²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71年12月7日。

分奇怪的是，在《回忆录》中吴却又多处提及林彪、叶群及吴自己在庐山会议前夕及期间多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页 779-780）“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页 780）“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页 781）“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页 783。据叶群检讨，吴向她反映的只是有人不同意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及说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林彪听了电话内容以后，只是说要给毛写信，并没有说对吴支持的话，而林要给毛写信一事叶从旁劝阻了）。

可以肯定的是，《回忆录》中上述有关“国家主席”问题的“回忆”，是与《检讨》的内容对不上号的，我们相信，与当时的事事实亦大相径庭。但是，吴法宪为什么在《回忆录》中自己要再次把水搅浑呢？为什么要林彪、叶群再次背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黑锅呢？这却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三、毛泽东袒护江青之一例

《检讨》中提及一件事：“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位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

黄永胜在 1971 年 3 月 21 日晚的检讨中也有类似说法：“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位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比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上

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吴、黄检讨均语焉未详。此事内情究如何？为什么吴、黄在事情过了几近一年之后还要在检讨中再次提及？

其实，这是黄、吴、李、邱与江青一次未算成功的斗争。

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对此事经过作了如下简要的表述：1970年5月17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同时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会上，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会后，黄、吴、李、邱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江青的言论，认为她要抓军权。毛泽东批评了江青。”⁴³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详细述及了5月17日这件事，但他把日期记错为“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了（页753）。另《回忆录》说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政治局委员，据黄永胜检讨及《周恩来年谱》应为七人，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姚文元、谢富治、李德生。

据知情人称，黄、吴、李、邱从江青处回来后感到问题较大，商量由黄、吴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后林办来电话召李、邱也去），林听了汇报后说：“江青把政治局大多数都攻击了，今天是直接攻击了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经毛同意，黄、吴从毛家湾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作了汇报。他们以为毛会大发江青的脾气，未想到毛只说了三句话：“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是可以的”，“江青也是一霸”，“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不要叫江青知道，你们今天和我说的这些问题，也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同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周恩来年谱》说毛批评了江青，是为毛作掩饰。毛表面应付说说“江青也是一霸”是假，实质上其实认为江并没有什么错（“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是可以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没准这一次是毛利用江放出的试探性气球？毕竟三年之后，不是毛领着批周的吗？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一年，为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在黄、吴的检讨中又被翻了出来？毛不是说不要叫江青知道吗？一检讨，江青不就知道了，黄、吴、李、

⁴³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页367。

邱不就“不好混了”吗？是黃、吳在此际主动公开（似有向江青示意以请求原谅之意。吳的《检讨》开头就有“在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同志多次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下”的话，将江的位置放在其他政治局成员之上），还是在某种压力之下被动公开的？向毛反映事情经过为何说成是“干扰”了毛？因当事人已全部离世，我们也再难追寻其缘由了。但无论如何，毛的态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是袒护江青的，袒护江青，也就是袒护着如张春桥之类的文革极“左”派。1970年5月17日向毛汇报的结果完全出乎黃、吳、李、邱等的意料之外（事后还被认为干扰了毛），但他们似乎未有看透毛的内心世界而未能认真吸取教训，直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吳法宪向张春桥叫板而败下阵来之后才发现，毛其实是可以不要林彪这个接班人却不能失去江青、张春桥之类他的真正的思想继承者的！惟这一发现，对于吳法宪等人来说，为时已晚。

2009年4月稿

2012年6月改定

【往事】

我的右派朋友蔡德恭

廖振旅

—

人生在世都会有要好的朋友。我不忘的好友之一是在湖南资兴县结识的蔡德恭。我俩朝夕相处 3 年加 8 个月，别后通信 15 年。相互不名只取姓，故我一惯只写一个字：“蔡”。

同蔡相识在“上山”之后“下水”之时。1970 年 10 月初，我这偏远大山里的下放干部到杨洞水库工程指挥部报到做临时工。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久闻大名，不识其人”。

这话让我的心紧缩一悚：自己是太黑太臭了！

是啊，两年前，我因起草或修改批判县武装部的多份大字报，被揪到全县四级干部三千多人的大会上连续批斗三个白天和夜晚，打入牢房 6 个月又 13 天，那铅印了数千份 18700 多字的罪状材料，散发到了全县每一个角落。我的臭名，全县还有谁没听闻过？

我说自己身戴“炮打三红”“黑干将”“黑笔杆”枷锁，叹惜一声：“没想到变黑了！”

蔡淡然一笑：“你没想到的还有呢，我 13 年前就变‘白’了！”

我吃一惊，不知何意。蔡说：“我是摘帽‘右派’，走过‘白专道路’，其实是‘白’而不‘专’。‘黑’和‘白’同‘红’相对立，你我有点像同道中人呢！”蔡刚过 25 岁被划右派时，是颇有名气的旧市完小校长，当时说过管教育的党员领导“不懂教育”等实话。

蔡接着说：“县城文革造反派没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他们定不了你的罪。斗了，关了，帽子戴不上，你比我幸运。”

我幡然醒悟，蔡说“久闻”我“大名”并无讥讽嘲笑之意，反有某种同情和理解。说我无罪，正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下子我同蔡感情近了，有点喜欢蔡的真挚和思维的独特。

二

杨洞是中型水库，县里的大工程。大坝已成，开始建设总长百里主渠道。我去时，正是秋收后大上劳力的第一个高潮年。全县 28 个公社、282 个大队各有副书记、副支书带队组成民工营、连，上了万余人。还有数百名技工从事隧道、渡槽、倒虹吸管和三级发电站等工程的常年施工。指挥部六七十名干部，少量从县直单位抽借而来，大量是地、县下放干部。下设办公室和政工、工程、后勤组，还有几个工区指挥所。

我和蔡在办公室，主要是办《工地战报》。我编稿子，蔡刻、印、分发。我常白天跑工地，夜晚改稿撰稿；蔡留守电话、处理内务。秋冬施工高潮中每一两天出一期战报，每期印三百余份，分发工地，寄发县领导、县直有关单位和各公社。时见蔡捏手、甩臂、揉眼、捶腰，纾解刻、印、分发带来的不适，却从未说出累、苦二字。我俩配合默契，得心应手。蔡长我近 4 岁却很尊重我。对刻印的文稿有不同意见必向我提出，从不擅改。我对小报编排和插图的创意，他都能心领神会，圆满意境于版面。蔡精雕细刻，钢板字有如铅印，标题、配图堪称佳品，加上套红，八开油印小报美观大方吸引人。小报以内容新、反映快、形式多、文字活、印制美获上下一致好评。我俩还灵犀相通，待人以礼，叙谈以诚。天天川流指挥部办事的人员，都喜欢来办公室同我俩或照面或交谈。就这样，仅由我俩做具体工作、在工程中不占重要位置的办公室，在指挥部集中干部评比时，竟然众口一词，被评为 4 个组室中的先进单位，我亦沾蔡的光，被评为先进个人。

三

工作之余，特别是施工淡季，我俩常在农村公路散步，谈论古今中外。不约而同，喜欢从“舆论一律”的“喉舌”报刊中，获取点滴世界和他国经济数据，对比本国，为中国的贫穷落后而感叹。也从几百年、几十年的历史中论及教训，为国家的曲折而激愤。从中得出结论：那天天叫喊的“形势大好”不是真相，那时时宣扬的“巨大变化”并非事实。

有次从钢产量谈到方针、口号。蔡说：“‘以钢为纲’，能‘全面跃进’吗？我看未必。工业产品百种、千种、万种，各有重要性，怎能只看重一种还把它抬到‘纲’的位置？一种产品上去了，千万种产品就能自动跟着上的话，那工业化就

太容易了！”接着说起大跃进中执行“以钢为纲”用群众运动土法上马炼钢的笑话，不断摇头叹息。

我很赞同蔡的看法。引发我对农业生产方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质疑。我说：“农村为何生产单一，农民为何无钱用，就吃了以粮为纲的亏，不能从实际出发。”

由经济推及政治。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处理一切”，蔡戏谑地说：“吃饭、拉屎，睡觉、生孩子，都是阶级斗争啊？”我也觉着是以偏概全，把许多不相关的事硬拉在“斗”字下一块管着，是指导思想片面性、绝对化，值得商榷。

诸如此类交谈，甚多甚多。我俩不是研究家，也无影响他人之意，仅仅从中感受思考的乐趣而已。有些话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我俩非“白”即“黑”，怎能公之于众？只能“你知，我知”，秘而不宣罢了。

我甚为欣慰，又有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音，三生有幸。

四

蔡对我关照、爱护，有如兄长。

指挥部在农村搬迁三次，我俩均同寝一室。有次我腹痛肚泻，蔡从农民家借来木马桶，提上楼供我夜晚使用，次晨提走洗净，又去厨房给我预订稀粥、面条之类半流质食品。

1974年4月中旬，县委书记同我面谈，要我回县委办。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先后来催我去上班，指挥长也劝我“服从安排”。我不愿去，要求调离资兴。因为县委大院内清一色党员，而我不是；我是造反派，而原县委机关留下来的人，全都是对立派。半个多月过去了，我还呆在指挥部不动。蔡对我说：“怎么不去？继续办油印小报消磨青春有出息么？回去是震动，是雪冤，是抽那些斗你关你者的耳光！你很能干事，又不是为了个人，那些党员、对立派吃不下你！再说，去了比这儿更好远走高飞呐！”听了短短几句话，“胜读十年书”！5月6日，我回到了被赶出五年半的县委办公室。六年后的帮助，我调回到离别22年的省林业厅。我感激蔡的启示，敬佩蔡的预言。

离別指挥部不久，我收到蔡写我的一首七言诗：“初见廖生貌不扬，人言可畏亦披伤。渐闻谈论多微中，未肯阿颜入胜场。累日从容应琐事，夜深灯火写文章。读书恐堕书生气，风物常新莫静观。”诗中饱含同情、夸赞、劝导、勉励之意，令我激情横生。即兴也凑了八句，附于回信中赠还。出我意料，蔡回信说我国赠的诗“不合格律”，建议“学点近体诗基本知识”。并写道：“诗言志，言为心声，真情所至方能跃然纸上。”信中还批评“时下流行的那些歌功颂德诗词，阿颜献媚，情不由衷，令人生厌作呕。”这些话如醍醐灌顶，我看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和不足。虽喜爱阅读文学作品，却不知古典诗词的深浅。我决心重学诗词格律和写作知识，鉴别、修改已撰的诗词楹联。持之以恒，虽无佳作而羞于示人，也自认水平有了提高，更没有做“生厌作呕”的“歌德派”。这方面，蔡称得上是我的启蒙师。

五

蔡面目俊秀，谈吐文雅，而内心孤独寂寞，忍辱负重——别人看不出来，我却深有感受。

我铭记蔡对我说过的话：“过了 1957 年，我的心就封闭了！坚守人前‘三不’：不谈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不公开自己与众不同的政治观点，不谋求超越本份的个人利益。碰到了你，前‘两不’才来了个例外开放。”富学识、会思考、有卓见的蔡，被堵塞言路、剥夺自由，生活在恐惧中，足见反右践踏人之残酷！

我离开指挥部的前夜，蔡破例摆下酒菜饯别，邀我在卧室中关门对饮。谈及反右的灾难，断送了事业，摧残了身心，又失去了爱人，蔡潸然泪下，饮声抽泣。那倾心爱恋、情同意合、才艺双全的美丽女教师，面对着右派情侣，痛不欲生而后黯然离去，蔡如椎刺心。谈话中，当即取出十几年来珍藏身边、思念伊人的十几首诗词稿让我过目。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情景浮现我眼前，肥皂泡般的结局激起我凝重的同情和惋叹。后来，低文化的农家女成了蔡妻。蔡说：“妻善良、勤俭，待我善待自己。我也忠诚待她。但她不是红颜知己，我们只是生儿育女柴米油盐夫妻。”话是何等淋漓坦诚，我也隐隐作痛！

蔡的月工资仅 38.5 元，是对“右派”经济惩罚所致。一家生活得靠妻子“做了队里做家里，忙了农活忙孩子”。蔡不得不用假日回家帮忙，助妻分忧解难。

我明白了：为何几年中没见蔡妻携儿女来指挥部探过亲，为何每逢较长假日，蔡必赶急回家。温饱是人生存的底线、发展的根基，忧困于生计而不得不为稻粱谋的蔡，会有多少快乐？

然而，蔡也确有其快乐：在工作中圆满忙完一桩事情时，在思考中弄清某个问题时，在阅读和创作中有了新感受新收获时。蔡说过：“工作给我安慰，思考给我启迪，诗词给我兴奋。只要钻进去，就会呈现新境界，就忘了还有自己。”在政治打压、经济窘迫的双重围困中，蔡找到了精神升华的突围之路！

六

上世纪 80 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我从报上看出，全国右派近乎全属错划而能得到改正，便写信给蔡，祝贺“卸绑缚之绳，还清白之身”。我想：这回，蔡该轻松了。

蔡的回信却让我振聋发聩。回信中说：

“他们是错上加错又再错，我是不服不服又不服。”

“回看五七鸣放，右派们是爱国为民英勇正义之举，被打入另册横加迫害，是党和权力逆历史潮流的罪过。当年我只说了个别事情、个别党员，并未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够右派却打成右派。他们错了，我不服！”

“资兴的右派全部改正，全国几十万右派没有几个不改正，他们还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已。‘有权就有真理’，睁眼瞎说，横蛮霸道。‘改正’只是一句话、几个字，错整了人不认错，伤害了人不赔偿。他们这是错上加错，我不服！”

“经过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联想到土改、三大改造、抓胡凤、批胡适、思想改造等种种运动，我看到了神秘面纱后的真实面目。国家不能搞这种社会主义，党不能无法无天，不彻底改变，就该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我够得上右派了，偏偏给我来了个‘改正’，是他们又一次犯错。对一党专政、专制社会主义，我就是不服！”

这信，我读完一次再读一次，禁不住双手击掌，拍案叫绝！

七

1989年6月4日，我赴衡阳市任职湖南林业专科学校。几个月后，突接蔡信告警：“身患癌症，住湘雅医院，盼一晤。”我惊愕失神，抽身返长沙探望。

资兴别后9年首次重见，不幸是如此场合！走进病房紧握蔡手，禁不住泪塞眼眶。蔡却微笑着，催我坐他床沿，轻声说：“我还有时间，还要回去继续做点编辑工作呢！”

我俩不知不觉又‘旧病复发’，谈话免不了牵连到时局和社会。

蔡紧绷着已刮瘦的脸庞说：“我已活过57岁，死也是在床上。比那些年纪轻轻的横尸街头幸运。”“和平时期，首善区内，用这种手段对付学生，古今中外，骇人听闻！……欠债总是要还的！”

我告蔡：衡阳六所大专院校，学生、教师、干部正在挨整，有的要受处分。我在校领导反思、党员重新登记中，也曾左右为难，不得不用文件官话、报刊套话保护自己。

我俩还扯到胡耀邦、赵紫阳、“四人帮”，甚至段祺瑞与“三·一八”惨案。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蔡余兴不尽，竟下床送我。临别，蔡说：“人，生为暂时，如外出做客；死为永恒，如归家认宗！”

这就是我俩的最后永诀！

三年任职期满，我重回省厅后，就出差之便去了早已县改市的资兴。特意拜访蔡的顶头上司广播电视台副局长——我在文革前的县委办同事。讲到蔡，他滔滔不绝，赞誉有加。说蔡任县广播电台副台长兼总编多年，“工作之勤奋，操守之高尚，上下一致公认。”病逝前，蔡留下“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言，“在资兴干部中是第一人，罕见！”

我猜不透蔡的遗言。是避免烦扰生者？是节省公帑开支？是视世俗如陋习？是讨厌那套话连篇的悼词？是对一生遭遇的愤忿？还是其中一二，或兼而有之？

2012.5.26

【序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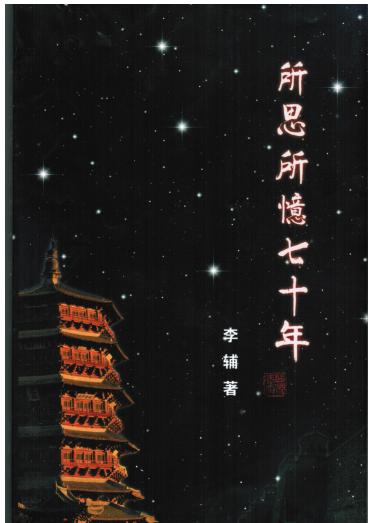
《所思所忆七十年》序一

吴象

《所思所忆七十年》的作者李辅同志是我的好友。从一九七一年春到一九七三年冬，我们曾在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共事。我是主任，他是当时唯一的副主任，可称为“老搭档”；我比他大17岁，情谊深厚，又可称为“忘年交”。

他是山西应县人，新中国成立时十岁，已经记事。此后一些全国性的运动，对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至于“文化大革命”，他更是第一线的参加者。他一生跌宕起伏，阅历非常丰富。他遭遇的幸与不幸，与这一段历史上一些事件和人物，有直接间接的联系。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很能引发人们的思索，进一步体会到中国人民过去的苦难，体会到中国能有今天的进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经历过多么复杂而痛苦的争斗。

一九六六年刘格平等五人大字报，把山西的“文革”推向高潮，当时整个太原市都动荡起来了。一九六七年初，紧接着上海的“一月风暴”，山西实现了“一·一二”夺权，以刘格平为首的核心小组取代了原省委。这骇人听闻之举，竟然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的首肯和支持。从此，打、砸、抢成风，派性武斗不断升级，动用了真枪实弹，法律秩序荡然无存。到了一九六九年，乱得实在不能再乱了，中央发出“七·二三”布告，命令69军军长谢振华统一领导驻晋解放军，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实现大联合、大团结，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措施，让省直机关所有干部，全建制迁离山西，参加消除派性学习班，只留极少数人协助解放军维持日常运转。我在文革前是山西日报总编辑，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被华北局紧急电话借调去当工作队员，接管北京日报（当时已称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阵地”），经过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之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被山西造反派揪回太原，接受批判、斗争。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我



在牛棚里接到通知，当天随报社全体干部上火车同行。到达后列队听解放军连长第一次讲话，他说：“我们大家都是同学，消除派性，不分这派那派，更不分‘造反派’、‘走资派’。我们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新的团结。今天分班分铺，每铺二层，上面住一个，下面住一个。年轻的手脚灵便，要自觉地主动睡上铺，让年纪大的睡下铺。”

我原来以为自己是跟着来当批斗对象的，听了这话暗自高兴，几乎一晚没睡着觉。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批评、检查，无论是造反派、走资派，还是其他一般干部，思想基本上都有了转变。太原安静了，各地、县有的人想闹也跳不了三尺高。学习班结束后，只让少部分急需的骨干回机关工作，大部分下放到地、县、社基层锻炼，陆续考察处理。我没有回报社，省领导要我负责筹建政策调查研究室，我就和军代表苏林一起忙着物色干部，找办公室。一九七一年四月初，召开山西省第三次党代表会，正式成立新的省委，我和李辅都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苏林对我说：李辅也要来调研室工作，当副主任。他是造反派里比较优秀的代表，文革前在省委党校毕业。文革初，被推选为省直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负责人。组织能力强，善于讲理，而且绝不参加打砸抢，为人比较公正。去年随一批老干部下放到太原郊区阳曲县，担任一个村的支部书记，使那个村的落后状况有了质的改变。现在还要交待一下村里的工作然后才来。

过了不久，李辅就到调研室来了。见面谈起，才知道我们原来早就见过。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我与刘江、刘贯文同时被省委借调去为山西省第二次党代会起草报告，办公厅又找了个新分配到机关的大学生，协助找资料，跑工厂，搞校对，这就是李辅。因为办公室相距甚远，只见过二、三次面，名字和人还没有结合到一起就分开了。这次说李辅要来，我也不知道是谁。见面才知道，二把手原来是个熟人，使我感到很高兴。他还是原来的模样，几乎没有变化，30岁刚出头，面孔白皙，英姿勃勃，只是体型偏瘦，像个文弱书生。我们很谈得来。但是开头一段，我还有点担心，因为调研室有几个同志资格比较老，行政级别比较高，能力也很强，心里是否服他呢？共事一段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了。无论行政能力、理论水平，还是处理人际关系，他作为副主任都游刃有余。但说话就不同了，实话实说，直言不讳。我们能相互敞开心扉，交流思想，逐渐成为真正的“忘年交”。调研室一共30多人，上下左右关系一直比较和谐，大家工作

起来都很愉快，在文革岁月中有这样的工作环境是值得怀念的。

调研室直属省委领导。当时山西省委第一把手是支左的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原69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也担任省委书记。我们接触他们的机会比较多，办公地点也离得不远，军代表苏林已调到谢的身边当秘书。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使文革败相暴露无遗，谁也心知肚明，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当时，经济政策有了和缓的趋势，省委对落实干部政策很积极，解放干部的进度比较快，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如何改变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调研室在省内调查研究，发现、总结了一些工矿、农村的典型，推荐给省委，省委比较满意。

李辅从一般干部到省调研室副主任，是一步很大的跨越，对他个人来说，可算难得的机遇。不过，我了解他的性格、志向，并不想长期在机关里呆着，更愿意下基层去锻炼，特别想独当一面，到县里去干一干。这年夏天，组织部门曾找他谈话，希望他去团省委工作，给王银娥（省委常委，基层选上来的干部）当助手，他在谢绝的同时，还推荐过张维庆。他又去找曹中南政委，表白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到了冬天，根据中央的部署，全省农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省委要派工作队下乡，他和调研室另外几个同志都自愿报名。十二月集训了一段时间，由他带工作队到襄汾县，兼任县委第一副书记。在临出发的一次大会散会时，谢振华叫住了他，对他说：“襄汾县担任书记的军队干部，身体不好，要求回部队，你去了先把县委工作抓起来。我已经嘱咐办公厅先电话通知下去，正式任命尽快给你办好，调研室副主任你仍挂着。”李辅怀着特别兴奋的心情到襄汾县去了。

一九七三年太原的局势较平静，偶尔街头出现少数几张大字报，未形成波澜。一九七四年初，省晋剧院上演了晋剧《三上桃峰》。不知怎么捅到北京去了，江青说此剧是为刘少奇翻案，要追查省委的责任。省委宣传部长被叫到北京，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接着全体省委常委也被叫到北京。江青穿上军装，在三八节那天对常委一个一个质问。谢振华仍然满不在乎，高声据实回答。此次会上，中央决定让陈永贵回山西主持省委扩大会议，继续揭发批判谢振华的问题。这个会开了三、四个月。谢振华还是昂首挺胸，准时到会，静坐听批，坦然而去，因为中央规定不许再搞批斗那一套，谁也奈何不了他。他是烈士后代，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延安时代的中央警卫局局长，要他向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屈服是不可能的。会议没有闹出什么名堂，但对全省工作造成的损失却是不可计算的。最后，谢振

华、曹中南调离山西，王谦当了省委第一书记。

接着又出了一件大事。一九七四年底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开会，选举四届人大代表，中央指定的候选名单里有王谦，由于派性因素，导致王谦落选。山西省委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后，王洪文在报告上批了“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政治事件”。四届人大山西代表团只好由王大任带队。四届人大结束后，中央留部分同志开会，王洪文、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等政治局委员先后讲话。王谦当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但重要的问题还得请示陈永贵。陈永贵在“十大”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从省到地、县、至大队四级书记一肩挑，这是文革以来的特殊方式。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陈永贵又成为副总理，显赫无比，大寨、昔阳的干部也一路高升，短短几个月中，省委、省政府一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都是从昔阳调来的。全省有十多个县，三、四个地区的第一把手，也都换成陈永贵“信得过”的人。九月，中央在大寨召开全国学大寨会议，这当然是难得的盛事。殊不知大寨文革中已发生质的变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经验，如向五种人夺权，大批判开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等等，正是极“左”路线在农村政策上的表现。强调学大寨，只能使“左”祸更加泛滥。

当时省委明确提出农村工作主要目标就是学大寨，建设大寨县。办公厅系统派 100 多人组成工作队下乡，我为队长，其他局、办出了三个副队长，十一月到襄汾。我在贾庄大队蹲点，参加县委常委，有时到别的点上看看。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考察，了解到襄汾是文革中临汾地区的武斗据点，受派性破坏很大，喜欢闹派性的人仍然存在，李辅大刀阔斧工作了两年，局势大有好转。基层干部和社员对他的反映是好的，是真正为老百姓干事的，敢于迎着困难上，排除干扰。他认真学习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对损害农民利益的做法，又敢于从实际出发，采取有利民生，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他以身作则，用人公正，不搞特殊化，所以在当地颇得民心。他秉性直言不讳，但有时注意场合不够。当学大寨运动成为复杂微妙的问题时，敢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还当众顶撞过顶头上司，而这位上司不久又升任省委书记。按官场的潜规则，李辅开始了噩运。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大悲大喜的一年。从年初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七月唐山还发生了八级大地震，亿万人民陷入深沉的悲痛与忧虑之中。没

有料到不久“四人帮”就被彻底粉碎了。全国人心大快，一片欢腾。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全国大讨论，推翻了“两个凡是”、“抓纲治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的讲话，会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总结批判农业七条“左”的错误，要求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古老神州充满了阳光和希望，历史大转折，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开始了。

回头再看陈永贵、王谦这几年走的是什么路呢？粉碎“四人帮”后，借清查运动之机，大搞排除异己。还没清查，就列出整人的名单。全国有“两个凡是”，山西又加了两个关于大寨的“凡是”，尽管不敢发文件下指示，但口头逐级传达，照样通行无阻。新华社山西分社给北京的总社据实写了内参。王谦得知后大怒，竟下令把分社社长方言抓捕入狱。其实，写内参乃是中央交给分社的任务，社长又非省委单独可以处理的干部。王谦未与总社通气商议，就动用专政手段，岂非利令智昏，违规违法？新华社社长穆青亲自来太原讲理要人，王谦一脸尴尬，只好放人。但娘子关内继续“划大线、切西瓜”，我和李辅也在劫难逃。一九七七年，山西各地上上下下“搞清查”，气氛相当紧张，伤害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省直审查对象被集中到交城“五·七干校”，以掩人耳目。中纪委派来毛铎、刘家栋为组长的工作组，调查核实，运动严重扩大的错误才有所收敛。十年文革，左祸横流。文革结束了，山西却来了一次比文革还“左”的大灾祸。

一九八〇年初，党中央成立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十分关注清查问题的善后，曾两次亲到山西调查了解，做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几家全国性大报纷纷揭露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弄虚作假、欺压群众的事实。山西三干会上也出现了面对面的质询、批评。八月的全国人代会上，陈永贵副总理职务被免，王谦终于不得不对错误做出检查。中央书记处把检查批转给各省，并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着重指出学大寨运动后期的教训，正式宣布学大寨运动的结束。这就是著名的一九八〇年83号文件。接着又任命霍士廉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和第二书记、省长罗贵波及其他同志一起，纠正、平反了大批的冤假错案。我一九七九年就作了平反结论，到另一个省工作。一年多后，又调到北京。从老熟人处得知李辅直到一九八一年四月才正式平反。九月到平遥县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县委书记。

霍士廉同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专程赶到平遥召集四大班子成员开会。

在县委汇报时，他插话说：“李辅是个好同志。今年五月间，我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曾把李辅的情况作了专题汇报。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和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说，像这样的同志要作为优秀中青年干部来培养。”会后又和他单独谈话，嘱咐他：“在派性严重的情况下要多调查、少表态，少说话。工作胆子要大，不要怕。”当时他非常受感动、受鼓舞，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下：“中央、省委对我这样的关怀，我一定要深刻牢记文革中的教训，为党好好工作，为人民多谋利益，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平遥在文革中遭受到的破坏比襄汾还严重，可以说是山西省的“老大难”。李辅到平遥工作两年，就做出了极为显著的成绩。他积极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左”祸遗毒很深的晋中地区起到破冰作用；他在人事关系复杂的情况下，果敢而又谨慎地平反了一起积冤 30 年的老案；他重视旅游经济，为保护这座后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做了不少有益的前期工作。平遥是我多次旧游之地，虽然他当书记这两年我没去过，但听熟人说起，很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我确实感到他更成熟了，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县委书记。

李辅被撤职离开平遥时，平遥县纪委副书记侯效良刻了一方石印送他。在印章的四周刻写了这样的话：“一九八三年是我县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全面推行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科技的巨大作用，夺得农业生产的全面丰收大幅度增产的一年，是农村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是以‘两户’为骨干的商品生产空前发展的一年，是开发性生产大见成效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一年，棉花总产九百万斤，一年翻番，小麦一年猛增长，递增九成半，治理碱滩三万八千亩，当年增收三百一十一万元，西王智、南依润三年头上翻两番，洪善、襄垣、王家庄、香乐、宁固、杜家庄、净化、达蒲、普洞山各自翻一番。效良铭此功绩敬书中共平遥县委书记李辅。”正是人走政声才是真啊！

我想，为什么李辅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创造出很好的业绩？这个业绩不是迎合上级的政绩，而是来自老百姓的口碑。王谦、朱卫华文革前都是省委书记。一九七〇年他们和李辅同时下放到阳曲县，都各自包了一个“老大难”村。为什么他们不能搞上去，李辅却搞了上去？看了李辅这本回忆录，我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李辅从小是在底层人民群众中间长大的。他的故乡不是偏僻的山野，而是一个小县城，周围连着乡村。李辅的父亲刻苦自学珠算和账务，从学徒成长为账房先生。兵荒马乱年间，曾因代老板保存“纸币”蒙冤，后得以澄清。一九五二

年又因商店合伙人在外违法犯罪，他作为商店经理被劳改四年。当时，只要家长入狱，子女必受歧视，李辅兄弟三人都受此牵连。李辅从小功课一直很好，求学的欲望很强烈，但不被高中录取，十五六岁就辍学，成了农业社社员，后来总算有机会上了太谷农校，又上了省委党校。在这期间，他多次下乡，和农民一起吃过大苦，一次再次地挨过饿。他是从群众当中摔打出来的。农民想些什么，他有亲身感受，所以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讲话能说到群众心里。比起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他当然了解农民更多。

世事难料，一九八四年前后，李辅在平遥县委书记的岗位工作得好好的，忽然又以上次同样的罪名，即参加过造反派组织，担任过造反派头头，被定为“三种人”，虽已查明，他没做过任何一件违反政策的事，但仍撤销职务，开除出党。我深知，这对他很不公道，也尽了自己的力，但终无结果。我没能帮上他，心里仍有一份歉意。

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以后，李辅回到了家里，过了一阵内心极为痛苦的日子，不久终于猛醒，对这种沉重的打击，绝不能屈服，必须挺起胸膛奋斗。他起初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以极大地毅力和希望，走上了信访之路。每每似乎有了希望，却又屡屡碰壁。这时，几个民营企业家找到他，邀请他去担任顾问或经理。他曾提出过不少很好的建议，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因种种客观原因，难有更大的建树。

李辅写这部书，断断续续用了十年时间。写出了自己七十年所做的事，写出了一生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写出了自己的所忆所思。书如其人，如何忆，就如何写，如同清泉一般，一眼见底，即便对邓小平，也直抒所思，毫无避讳。

在这件事上，丁东同志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丁东是当年在调研室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一九七七年考取山西大学历史系，后到省社科院工作。这位青年人思想活跃，适合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上世纪 90 年代末，提前退休，回到北京，自由撰稿，不怕风险，到风浪中闯，结果干得又自由又实在。他在李辅遭难时常往看望，李辅写书，他对全书内容和结构多次提出建议。在他的帮助下，大概出版不再是前景渺茫。

我认为《所思所忆七十年》是李辅晚年一大成就。他没有再花精力去上访申诉，而是直接面对社会，叙述一个苦孩子、穷学生如何成为优秀的党员干部。正

当他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能挑起重担的时候，又是党把他置于绝地，抛弃不用。他不是孤立的讲这件事。而是结合历史大背景述说自己的人生悲剧，就不能不引人深思。霍士廉到平遥召集四大班子成员开会，我是看他的书才知道的。山西省委后来处理他时那些不光明正大的做法，更是看了书才知道的。书中和盘托出，前因后果就清楚了，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李辅自己来说，写这部书比读几年研究生更有提高。对这个沉重打击引起的怒气、怨气，在写作过程中已经淡化。虽然党籍没有了，还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李辅虽无愧于心，但对国家来说，却埋没了一个能够为民造福的人才。对他了解的人，无不深感惋惜。我知道，因为清理“三种人”而被埋没的人才，远不止李辅一人。历次政治运动打击伤害的人才，就更多了。我们国家，到现在也没建立一个举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干部制度，反而到处贪腐成风。当山西省委一次再次坚决要把李辅清除出党时，襄汾、平遥的老百姓，却一直把李辅当作清官来怀念，这才是我们党最要深思的啊！

是为序。

2012年4月14日

【序跋】

《所思所忆七十年》序二

丁东

李辅先生长我十二岁，我认识他将近四十年了。1972年，我从一个插队知青被抽到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当干部，当时21岁。那年李辅33岁，已经是调研室副主任，副厅级干部，是我的单位领导。当时知道他在文革初期是省直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负责人，由此而当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约一年时间，后下乡挂职锻炼。一年后李辅出任襄汾县委书记，我也转到襄汾工作队，两个月后我得了肝炎，回家养病，从此和李辅再无工作上的联系。但和他一直保持交往，成为朋友。他一生三起四落，我目睹了其中的两起三落，感到他一生很不平凡，所以一直建议他撰写回忆录。

之所以认为李辅的经历不平凡，因为他兼有造反派和清官两重身份。文革中因造反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不算太少，但有机会出任一方首长，并在任上有出色政绩的并不多。文革中的干部政策虽然是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但青年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多任副职，难有大的作为。而李辅却两度担任县级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襄汾县委书记近四年，在八十年代初期担任平遥县委书记近三年。这六年左右的时间，给他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和才能的机会。他一方面努力贯彻彼时党的路线和政策，同时内心一直怀着廉洁公正、造福百姓的社会理想，加上他出众的行政才能，所以很快打开局面，成为深受当地群众拥戴的清官。二三十年过去了，他的故事至今在当地口口相传。尤其二十年来吏治腐败日甚一日，就更被当地群众所怀念。

李辅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方清官？又为什么被强行赶下政治舞台？这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学问题，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学问题。

从主观方面看，李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毛泽东关于干部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谋利益，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等号召，他是真诚信奉，身体力行的；对大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也是真心佩服的。但他又不是一个愚忠型的干部，他同情百姓疾苦，力求从实际出发变通政策，施政用人，所以，他一旦获得到主

政一方的机会，很快就能改善当地政情，让百姓受益。平民百姓通过前后左右对比，自然对他表示由衷地拥戴。

从客观方面看，李辅两度担任县委书记，也是特殊年代和山西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一直实行以党治国、党管干部的体制。虽然党的层面有党代会，国家层面有人代会，但由谁出任哪一级领导干部，实际上都是党的领导人内部安排的结果。讲究资历，论资排辈，逐渐成为安排干部的基本秩序。如果说，在建政之初，参加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代人还比较年轻，那么到了六十年代，他们就不算年轻了。但是，文革改变了这种秩序。毛泽东决心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重洗牌局。在一个公民多年不能实践结社自由的国度里，结社自由的大门猛然敞开，一些思想敏锐，政治潜能活跃的年青人，一下子成为群众组织的领袖。28岁的李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了山西政坛新星。毛泽东要在组织上巩固文革成果，就要在各级政权机构里提拔一批文革中涌现的青年干部。这使一些年青人获得了原有秩序里得不到的从政机会。李辅34岁出任襄汾县委书记，已经是以副厅级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这在当时还不是最年轻的，因为有人三十几岁已经被提拔到中央领导层。文革中，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的意图有过多次调整，事态的变化常常超出他的预想范围，身处领导层的高级干部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一批又一批响应号召冲锋陷阵的小将，因为不能适应高层战略部署的变化，被高速旋转的政治离心机甩出去，成为牺牲品，屡见不鲜。相比之下，能够在政坛立足者，还要有特殊原因。李辅的性格中不只有敢于斗争的一面，还有善于协调的一面，后者正是不少造反派领袖所缺乏的。所以直到毛泽东逝世，他还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算是那个年代的幸运者。“四人帮”倒台以后，山西的清查运动搞成了一派对一派的整肃。省委书记王谦背靠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把和前省委书记谢振华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派干部，当作“四人帮”帮派体系整肃，受迫害者数以万计，李辅在劫难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从权力顶峰开始跌落，陈永贵随之失势，中央派霍士廉、罗贵波取代了王谦。李辅翻身，得以重新启用，担任平遥县委书记，成为平反冤假错案，推行新农业政策的得力践行者。毛泽东有害怕后人否定文革的心病，邓小平、陈云也十分担心后人为文革翻案。于是，他们力主把所有文革中提拔的青年干部赶下台，并以“三种人”之名，把一批当过群众

组织头头的人开除出党，有的甚至判处徒刑。李辅被撤职，并以“三种人”之名开除出党，与其说是山西省委制造的冤案，不如说是这种政治大背景下的必然。

所谓“三种人”，官方的说法是指“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打砸抢行为比较容易分辨，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却有很大的弹性。共产党就是造反起家夺取政权的政党。毛泽东治党治军历来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后来的领导人也不例外。在这里，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却成为剥夺一批人从政权利的理由。对于这些被定为“三种人”者，不认识他们的，容易接受主流舆论的妖魔化宣传，把他们想得很坏，但和具体的“三种人”有较多接触和交往的，往往发现他们是一部分很有能力的中国公民。毛泽东执政期间，政治运动过几年就来一次，每次都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每一次都有积极分子。“三种人”其实也是一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所不同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没有被彻底否定，而这次政治运动被彻底否定了。

从1966年春天到冬天，毛泽东有关文革的动员令发出过多次，有的是以毛泽东本人的言论和文字发出的，有的是以党的文件发出的，有的是以党报党刊的社论、评论发出的。

大而言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6月1日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算一次；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通过“十六条”，算第二次；10月《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算第三次；1966年12月26日和中央文革的谈话，1967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1967年初对上海一月革命的支持算第四次。

毛泽东每一次动员，都吸引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响应。每一次动员也都得到了一部分中央领导成员的支持与拥护。就像剥笋一样，原来的中央领导成员，一批又一批先后沦为运动对象。但在运动的烈火烧到自己身上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是力图紧跟毛泽东，参与整肃前一批运动对象，并不心慈手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例外。当时，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学生和其他社会成员，在最高领袖一次又一次动员令面前，谁有定力不为所动？文革中登上政治舞台的年青人，与其说是追随林彪、“四人帮”起家，不如说是响应毛泽东起家。至于哪一次动员令成为他们行动的契机，则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有的是一经号召便投入运动，有

的是受到迫害后揭竿而起，到了后来，那些文革前各级党组织精心培养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都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邓小平主政以后，从彻底否定文革，到清理“三种人”，文革中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基本上都被剔除，只有文革初期风光一时的部分高干子弟受到特别保护，不影响他们的仕途升迁。这都是老人政治的产物。有关回忆文章表明，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中央领导人，对清理“三种人”并不积极。他们头脑中有更多的现代政治理念，更愿意依法治国，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更多的群众拥护的干部参与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他们在中共中央名为总书记，实为“大秘书长”，不但在清理“三种人”问题上作不了主，连他们自己的去留也作不了主。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与造反？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社会问题。八十年代的流行舆论，试图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解释：造反派都是政治野心家。这样的解释，其实没有说服力。文革之所以延续这么长时间，波及面这么深广，固然是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的结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十七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发酵的产物。自从 1949 年共产党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一直采取自我授权的专政体制。各级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选民的赋与，而是来自上级党组织赐与。久而久之，共产党官员队伍势必演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官僚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的矛盾已经相当严重。毛泽东发动文革固然是想打倒“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同时他承认中国存在官僚主义者阶级，承认和旧社会差不多。他提出自下而上地揭露体制的黑暗面，用巴黎公社的原则，来防止社会公仆变为主人，在当时占领了道德制高点，颇具精神感召力。这是吸引相当一批有社会理想和正义冲动的志士投身文革，参与造反的重要原因。李辅出身底层的农民家庭，偶然的机遇使他进入省委政研室和省四清办公室，亲身感受到高官与百姓生活的悬殊。这也成为他在文革初给省长王谦的夫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心理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 1957 年积极参与鸣放而被打成右派的某些知识分子，其实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右派是当年就遭到报复，他是十几年后才品尝苦果。

十年文革，中国没有找到化解官民矛盾的途径，80 年代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仍然没有找到化解官民矛盾的途径。90 年代以后，中国演化为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社会格局，官民矛盾比毛泽东时代更加普遍、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回忆

录最后一章谈到晚年几次出境旅游的见闻，并非闲笔。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把公共权力关进笼子，由广大公民实施监督，用宪政的方式保障官权民授，官仆民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政治梦想，而是一些国家和地区行之有效的现实。在那些国家，官员面对公众，不能不谦卑，不敢不廉政。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而是因为受到制度的严格约束。中国人关于清官和廉政的梦想，在彼国彼地早已成为常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格局中，公民有志于从政做官，是正当的职业选择。有没有机会做官，则取决于你的政治才能，取决于你能否被广大选民认可。中国要想告别贪腐横行，两极分化，民怨蜂起，道德沦丧的困境，除了接受普世价值，融入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走向民主宪政，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出路。

本书的价值除了政治史方面，还有社会史方面。以吃饭问题为例，从民国年间县城小吃的繁荣，到建国初饿着肚子帮母亲人工碾米磨面的艰难；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到文革中石家庄学习班伙食费花不出去；从文革前县委书记到省里开会吃西餐出洋相，到改革开放初期当县委书记面对公款招待的两难，全书有关吃的鲜活细节多达几十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卷浓缩了的中国当代饮食史。其中有的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的是人们比较陌生的，是史家不曾记载的，这就更显可贵。

本书在微观细节方面的长处，也反衬出宏观反思方面的弱点。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困惑，还在求索，还没有形成定见。作者决定以叙事为主，先把一生的经历和见闻诉诸笔墨。这种选择是明智的。我相信，这本书将引起文革研究者和当代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为历史的长卷增添独特的一页。

【访谈】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三）

文 静

十三

那时候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各个省、市都在组阁，一个个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是说，文化革命要“收”了，要开始规范了，淡化派系，要“大联合”。那么你重组的这些个班子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要哪派、不要哪派，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刚才提到的那个陆公达，当时是“中央文革”文艺组的成员，分管中央直属文艺院团，就开始筹备各个院团的领导班子。那时候他一次次的找我，但是因为我对这些已经没兴趣了，老领着大家出去跑。1967年的7月份，那次我都到北京火车站了，他派人把我截住，直接拉到沙滩小红楼，就是老北大的那个地方，当时是“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办公地点。他说要组织音舞口的“革筹小组”，那就相当于现在文化部的艺术局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局长”由我来做，全称“文化部音舞口革筹小组组长”。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大联合，必须各个派的人都有，大概挑来拣去，反对派里方昕还不错，于是就找到了我。

我不想干，说：“文化革命一开始，我爸爸就跟我讲，我的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水平没多高，将来难免犯错误，搞不好就得挨整。而且，从小到大我连班长都没当过，我没这个能力。”听了以后，他说：“嗨——，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都知根知底，过去他也什么都没干过。他说：“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有什么了不起？最大不过，回去还拉我的大提琴。”

但我还是不干，他说：“用你们这派的人，这已经是定了的，如果你非不干，你看谁干合适？”我想了想，说：“有个叫危大苏的，他比较有激情。”危大苏是附中刚毕业就文化革命了，所以要从大学说，他是最低班。但这个人挺能煽惑，在我那时候的观念中，革命领袖就应该像列宁那样，有煽动性、有号召力。危大苏过去在我们派里是个管宣传的，愿意张罗，愿意出头露面，而且我看出了这个人是个“官儿迷”，所以就推荐了他。

果然，危大苏后来被任命了，成为“文化部音舞口革筹小组组长”。那时候

他大概连二十岁都不到，但那是共产党任命的真官儿，跟群众领袖不一样了，待遇之类什么都有。到音乐学院来，礼堂里过去赵沨、解放军坐的那个位置，现在就是危大苏的。一说：“现在请文化部音舞口革筹小组组长危大苏同志讲话。”于是他就站起来，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师生员工们，我代表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啊——，台下一片欢呼鼓掌。你想，他是管音乐学院的，芭团、舞剧团、歌剧院、中央乐团等等，各个院团的领导班子都归他管，牛逼啊！

记得有一次在工人体育馆开大会，批斗谁我不记得了，反正是一次大的群众集会，我是跟着音乐学院的队伍去的。后来一个音舞口的负责人找我，说：“陆公达叫你。”进贵宾休息室，里面铺着地毯，摆的都是毛主席接见时候那种巨大的沙发，正中央、首长的那个位置上坐着陆公达，翘着腿儿、抽着烟。音舞口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围着他坐一圈，包括什么薛菁华、刘庆堂等等，各个院团“革筹小组”的头头脑脑都来了，都是坐在地毯上。现在，是陆公达“接见”大家，嘿嘿嘿，他妈的那个劲头儿。加上文艺界这帮人又都会拍马屁，那个毕恭毕敬，那个荣幸啊。因为在大家的感觉中，那是每天能见到江青的人物，感觉就是——过去太监出来，皇上握过他的手，你再握一下，也能沾点儿仙气。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同学，反正我就在旁边坐着，他还说：“你的革命意志消沉，你要把当年造反那劲头儿拿出来……”

前前后后，屈指可数没多长时间，王力、关锋、戚本禹很快就倒台了，文艺组里的人全部被抓，都给送到秦城监狱了。金敬迈原来是广州军区一个文化干事，因为写了《欧阳海之歌》，直接调到文化部。据他回忆，一共在文艺组里呆了四个月零三天，后来关了他十一年。危大苏也一样，上去没俩月，被关了五年。唉呀，老天爷本来是要我进去的，结果让我逃了一劫——假如当时我答应了陆公达，那在监狱里呆五年的不就是我了么？这事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觉得后脊梁出汗。

至于陆公达，中央乐团说他是“五一六”，大概是1967年的10月、11月，跳楼自杀了。从四层楼，坐着下来的。因为乐团就在和平里，跟东方歌舞团挨着，后来我到东方歌舞团工作，他们说，当年陆公达跳下来，他们还一块儿抬过。把他送到和平里医院，在走廊里还喊疼，大夫问怎么回事，说是“五一六”跳楼，那就等着吧。也没人管、也没人问，生生就那么疼死了。

什么叫“拱卒”，不过了“河”，连横着走都不许，而且还不让你退。陆公达最后是把命都搭上了，所以我就老想他那句话：“最大不过，回去还拉我的大提琴。”【致编辑：引号内烦请加粗】可能到最后那一分钟，他还在想：“他妈的，我什么也不干了，让我回去拉大提琴好不好？”可惜呀，哈哈，没那天了……

十四

有个顺口溜，“东西胡同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拿起狗来砍砖头，砖头咬了人的手……”完全就是颠倒过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文革也是这样，有些事情说起来可乐，其实荒唐透顶。

大字报。文革时候各个单位都瘫痪了，除了食堂保证正常开饭，其他什么都不干，连扫厕所都交给“黑帮”了。毛主席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以学校要保证供应纸、笔、墨，然后你就随便写、随便贴。全北京这么多机关、单位，大字报是铺天盖地，有人骑着自行车挨着排儿的去揭，一个月废纸能卖出一辆自行车。

文革时候看大字报，那绝对是件非常、非常逗的事，什么都有，而且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基本都跟革命无关。记得“管三”那班有俩拉提琴的，一个叫钟建华，一个叫屈志定，是西安音乐学院送来代培的。“同行是冤家”，本来这俩就互相瞧不起，文化革命以后打派仗，别人斗院长、斗书记，他俩是“窝里斗”，每天给对方写一份大字报。屈志定给钟建华起了个名，叫“钟奸猾”，钟建华也给屈志定起了个名，叫“撅着腚”。俩人每天一份、每天一份那么写，真的、假的，杜撰的、胡编的，什么屎盆子、脏盆子都往上堆，大家就都看热闹。再比如农科院，有一个管档案的女干部，老公是个老革命，战争中受过伤，大概夫妻生活不行，她就跟他们办公室一个什么人秘密交往，很多年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女的喜欢写日记，最逗的是，她还愿意把那点儿事详细记录下来，哪天、哪天，几点钟，在哪儿，什么感觉。档案室属于机要部门，外人不许进的，大概她觉得最安全，于是就把日记锁那儿。结果到了文革，档案室被造反派砸开了，翻出这本日记，好家伙，上了大字报，天天的连载。唉呀，那真是太惨了，太惨了，嘻嘻嘻嘻……

有一件事情，当时很轰动，这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被关在湖南监狱里面，是个政治犯。为什么呢？刘少奇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

个人拿着这本书逐字逐句地批判，对照毛主席的书，看它哪句、哪句跟毛主席说的不一样，后来就给关了起来。文化革命一开始，监狱系统也有人造反，其中有一派就把这人弄出来了，认为他先知先觉，是个“先锋”。于是就把他抬出来了，全国各地去讲，包括到北京来，讲他怎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怎么识破刘少奇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文化革命打派仗，你们说他是革命的，我们就得反对，于是另一派的人就去监狱里查资料，结果发现这哥们儿不仅批判刘少奇，还接着批判毛泽东，在《毛选》的字字句句当中对照，看它跟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有什么不一样。“连毛主席都反对，那他还不是反革命？”于是两派就打起来了，这派说他是革命的，那派说他是反革命，先是辩论，然后就打派仗，一直打到中央，轰动一时。最后中央表态了，说：“他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革命，他是神经病。”接着送回监狱就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以后他的事就别再说了，哈哈哈……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人叫林岭，那也是文化革命中的一个逗事儿。他是50年代就在学校了，因为是孤儿，从小参军，然后被送到音乐学院进修。从年龄讲，他早该毕业了，像他的那些同学都参加工作多少年，老婆、孩子一大堆了，结果他还在学校上学，年纪比谁都大，于是在附中的团委里，他是领导之一。后来他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团干部，姓王，学音乐理论的，但被这个女的坚决拒绝了，说：“学校不许谈恋爱，咱们俩是工作关系，你不要搞这个。”前脚把他拒绝了，后脚这女的跟刘诗昆好上了。后来学校知道了，刘诗昆没事，但是把这女的处理了，劝其退学。因为这件事，林岭大受刺激，“好么，我跟你正儿八经的谈，你不谈。他是有妇之夫，你跟他直接上床……”他是怎么也想不通，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一下疯了，犯病的时候就得送安定医院。

疯子怎么治呢？轻的吃药，跟迷魂药一样，就是让你迷糊了，像他那样太厉害的，直接就是拿电击。孙兆申他们送过他去，几乎就是捆着，到那儿以后先挂号，大夫问：“怎么病啊？”啪！林岭把脚翘到桌子上，说：“我没病！”大夫一看这样，就跟孙兆申说：“行了，你们都走吧。”他们就到外面，坐在椅子上等。半个小时以后，大夫说：“你们可以把他拉走了。”他那时候已经是屁滚尿流、嘴吐白沫，拉回去几天人事不省，接着几个星期见人都不认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得去一次。你想想，就是再好一个人，这么一治，你也神经病了。

到了文化革命大串联，各地的红卫兵到音乐学院来。那时候冬天多冷呢，冰天雪地的，林岭能穿着背心、裤衩在音乐学院操场上练气功，把那些红卫兵都给惊呆了。而且，他还把当年解放军那身衣服穿上、（下图：批斗刘诗昆）帽子戴上，站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讲演，以他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我是一个孤儿，解放军救了我，送我到音乐学院上学，被修正主义的音乐学院迫害成这样。……打倒赵汎！打倒刘诗昆！！”因为他最恨的就是刘诗昆。就那么着，得有上千的红卫兵围着他，听他在台上控诉，大家一块儿喊口号。喊着喊着，突然他又开始说了，“我都三十好几，到现在没结婚，还没有个对象。那个江青，……”

好家伙，开口他就敢讲江青，说：“你看那个江青，她接了五次婚！”？！——，下面立刻鸦雀无声，等回过神来，马上就喊：“打倒反革命——”直接把他押到公安局去了。半夜公安局打电话给音乐学院，说：“你们来领人吧，这人也不是反革命，他就是一疯子，我们这儿没法处理。”

后来一直到我们下农场，他跟我们一块儿到了天津葛沽，那是江青同志把我们送去接受再教育的，所以那些解放军是想怎么治我们就怎么治我们。在这个“再教育”的舞台上，林岭又是军人出身，又是苦大仇深，解放军把他当作红色典型，在多少学生面前开会。讲、讲、讲，突然他又讲：“那个江青，……”他老记着江青接过五次婚，并且耿耿于怀。最后没办法，把他又送回音乐学院了。

过了两年分配工作，他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迫害我，得给我解决几个问题。学校说：“那你说吧，什么条件？”他说，第一得让我入党，革命这么多年，你们得给我解决组织问题。第二，要解决婚姻问题。他点了三个人，谢达群、俞安玲，还有一个谁。要知道，音乐学院招生不考虑形象，所以美人儿不多，最漂亮的这仨都被他看中了，而且还比较宽，说是哪个都行。第三，要解决工作问题，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哪个都可以，其他团不去。结果这仨条件哪个也给他解决不了，听说后来分到山西，还找到了他的亲姐姐。但是他没法工作，最后被他姐姐带回青岛，没多久就死掉了。



.....

十五

那时候，所有人在无形当中都分成了派。大家观点不同，你一说话、我就反对，哪派当领导都有人不服气，各个单位等于都是无政府状态，虽然成立了“革委会”，但没有什么权威。于是快刀斩乱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派无产阶级来，他就代表毛泽东思想了，甭管你是哪派的，还有什么话好说？

1968年的四、五月份，工宣队到音乐学院，那是北京什么工厂里的，是真正的工人。来了以后，把我们所谓的头头儿都搁在一块儿，说：“毛主席派我们来，就是要改造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什么这派、那派，臭牛逼，告诉你们就一个派：毛泽东思想派！”然后拿出《毛选》，随便翻出哪页，说：“×××，你来背。”那谁背得出？他们是来建立新领导班子的，但由于对于文化、对政策一点儿都不了解，只能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大概正因为这样，后来就只有靠镇压了，这回谁也不许说话，用暴力、用残酷的手段，把文革中的那些积极分子们全都镇压下去。

1967年的秋天，那时候已经开始抓“五一六”了，但只是一阵小风，过去就过去了。钢院有个很小的组织，叫“五一六兵团”，它的重心是要攻周恩来。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等早都被“挂”起来了，有人就认为，下一个该轮到周恩来。实际上，这个组织的人非常少，也没什么影响，而且没几天就完蛋了，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完了之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大家谈恋爱的谈恋爱、游泳的游泳，整天都那么闲着。但是到了1970年，突然就铺天盖地的找“五一六”，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

“五一六”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就知道那是一个反对总理的组织，所以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积极和坚决，像陆公达、危大苏都是他亲自点的名。与此同时，江青也在抓“五一六”，反正谁去抓“五一六”，谁就能借这件事情清除异己。现在看来，抓“五一六”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但是后来我看到材料，又听我爸爸他们讲，1942年在延安整风，那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是从大后方来的，说你是国民党特务，你承认了，那就没事，你不承认？打死也是白打，就算你跳河，那也是“死反革命”。“五一六”也一样，

特别是在地方上，那就更厉害了。因为在一个具体的单位、具体的部门，派性并没有消失，而文革中，大家所积的怨是很深的，正好要抓“五一六”，那就往死里打、往死里整，公报私仇整死了算。（下图：1970年5月，在天津农场。）



音乐学院的“五一六”是在农场时候抓的。我们这届本来应该1967年毕业，结果到了第二年还在学校呆着，有些学生生活都成问题。1968年11月，名义上叫做“分配”，实际就是连锅端，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全部下放到天津葛沽农场。其他那些在校生跟着老师到河北清风店，或者去了张家口，音乐学院就没人了。

我们在农场呆了将近五年，叫做“接受再教育”，归解放军管，生活、作息完全按部队的。经常是大半夜紧急集合，打背包，连长说：“蒋介石现在登陆了，我们要紧急集合！”然后就叮里咣当跑一大圈，一个多钟头围着湖瞎转悠，跑得大家呼哧带喘。然后回来了，解开背包睡觉，到早上五点钟，“当——”又紧急集合，又得起来。部队里整新兵也是这样，用尽各种办法，甭管讲理不讲理、对不对，你得“服管”，不能有丝毫的反对。再比如，所有人都要轮着班的夜里站岗。你想，大冬天的，白天又是军训、又是干活，然后半夜两点钟把你推醒，那是什么感觉？后来男生连有人自告奋勇，是个弹钢琴的，因为老失眠，后来就“包”给他了，早上叫大家起床，他也有这个“瘾”。跑到女生宿舍，趴窗子那儿往里看，一边看一边叫唤：“起床啦，起床啦！”女生就在里边喊：“臭流氓——”

1970年5月开始抓“五一六”。那时候就是这样，谁的动作跟快一点点，谁

就占了上风。好比说，我已经站在这儿了，我宣布自己是左派，口号已经喊到这儿了，你再来，也只能站我旁边，那你就比我右一点儿。那时候要人人过关、人人检讨，首先把我们这些头头儿都隔离起来，然后“大搜查”，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往下捋。

同学中有个叫孙兆申的，吹圆号，虽然很用功，但牙不太好，业务有限。这个人在政治方面比较敏感、比较开窍，属于那种往上爬、往上钻的。但是没什么背景，只能顺着坡走，有机会就上，没机会就阴着点儿，平时打打小报告、当个探子之类。文革中，他看准刘诗昆，在“战斗团”里当个——用现在的说法叫“保卫处长”那么个角色，打架冲在前面。抓“五一六”时候，他属于一看就明白的，第一个交代说“我是”。所以他第一个被解放，而且深得信任，变成了反戈一击的有功人员，该结婚结婚、该探亲探亲。可是像我，关了两年都没有自由，一直到1972年8月才出来。

我们在这边挨整，张家口那边抓“五一六”也很厉害，学生给打的哭爹叫妈，结果就有人开始胡说，而且说得没边儿了。说曾经计划进攻中南海，在团城上架了炮，准备把周恩来打死。问是谁指挥的，“……孙兆申。”在他们派里，只要打架，孙兆申都冲在最前头，所以要是的话，他肯定是指挥官。就这么着，这些材料又反馈给天津葛沽，解放军一看，那吓坏了，大半夜的把他从被窝里揪出来。他那儿还做美梦呢，以为自己是革命群众了，解放军一拍桌子：“孙兆申，你最坏！枪毙都多余！！”也没跟他说是什么事，就说：“想活想死？你回去自己交代。”但他怎么能想到是那么大的罪过？而且他知道，肯定是有人胡咬，根本说不清楚。那天晚上，他觉得实在不行了，“枪毙都多余”，那得多么大的罪过？越想越觉得没法活。听说烟丝泡水能喝死人，于是他泡了一大缸子，咕咚咕咚都给喝了，喝得直冒虚汗，但没死成。那时候的电灯还是老式的拉线开关，于是他把那盖儿拧下来，直接摸了电门。一来农场的电没有保证，经常就没电，二来电压低，所以一摸就打火，又没死成，还得接着挨斗。

孙铁也是，开始不承认，但就这么天天斗，打他，而且跟他说了，“承认了就没事”。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承认了。回去以后，想来想去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反悔，说自己不是“五一六”。好家伙，那就往死里打，不打白不打。

音乐学院还算和风细雨，没有因为抓“五一六”死过人，但是像中央乐团，

那是死了很多人的，比如陆公达。还有一个叫门春富的，大管吹得不错，他是贫下中农出身，学校里就是党员，这么一个“根正苗红”的人，逼着他承认，后来上吊自杀了。我们在农场时候，旁边是外语学院的院子，他们也被下放劳动，死了好多人。晒海盐的池子，那水也就刚过了膝盖，能有多深？就有大学生在里面淹死。而且，淹死了以后还要开批判大会，把他的家长请来，说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要跟他划清界线。

那时候，绝大部分人都承认了，而且也没有说像现在还去核实，没有的。承认了就OK，马上解放；不承认，你就是“死不悔改”，最好你去跳河，大家都省事了。

我是没有承认，坚决没承认，所以一直关着。现在想起来，大概我对这些事情还是有“预防针”，因为我父亲说过，没做过的事情就不要承认，否则将成为你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所以我挨打也很厉害，牙都打坏了，毕竟那些解放军也是简单粗暴。领导我们的那个头儿姓吴，是个主任，具体带着抓“五一六”的姓黄，参加过抗美援朝，我们叫他“指导员”，按说也不是个大官儿。像他们那些承认了的，之后要开个简单的——也不能叫“欢迎会”吧，反正得有那么个仪式，听他痛哭流涕的检讨，然后大家表示欢迎，欢迎他回到革命队伍。这些活动都不让我参加的，所以谁交代了、谁没交代，我都不知道，完全处于被隔离的状态。后来怕我串供，给搁到在打麦场边上的一个小土屋，叫做“场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学生连”远远的，然后派俩人看着。

开始是两个学生看着我，其实他们出身都不好，比如家里是“地富反坏右”，在文革中属于哪派都不要的，现在倒成了被信任的人。类似还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就出了很多笑话。声乐系一个男高音，叫林徐伟，长得人高马大，是个印尼华侨，文革中哪派他都想参加，但是哪派都不要他。后来整“五一六”了，解放军一看他哪派都没参加过，就让他当了积极分子。他也特别积极，本来嗓门儿就大，每次发言最冲，指着你鼻子就骂“叽叽叽叽叽……”，这种人最招恨了。所以来孙铁承认了，让他交代都发展了谁，他先就交代了林徐伟，当天晚上就把他揪出来。解放军说：“林徐伟，你这个大坏蛋，伪装积极、假革命，你是真反革命！”很久以后，林徐伟自己说，自从把他放到抓“五一六”的这个组里以后，感到那种从未有过的受党的信任：为革命，我千里迢迢、万里迢迢从印尼来

报效祖国，现在终于有劲儿可以使上了。“我一直以为你们都是‘五一六’，都是坏蛋，直到他妈的把我从被窝里揪起来，一下我就全明白了……”哈哈……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学生看着我了，换成两个解放军。从早到晚就我们仨，晚上睡一个炕，白天什么活儿也不干，革命群众特别有意见，因为他们得种稻子，那是很辛苦的，比如育秧。春节一过就开始育秧，那时候水还带着冰碴呢，革命群众咬牙切齿，说：“不能便宜了‘五一六’，这活儿应该他们干呐！我们革命群众学《毛选》就行了，怎么能让‘五一六’在屋里呆着？”收稻子的时候，扛麻包，一个怎么也得上百斤重，所以90%的人后来都腰间盘突出，尤其是女孩儿，全都把腰压坏了。

关那两年，我都干什么了呢？抄《毛选》。我小时候字写得不好，经常被人笑话，既然关起来了，没事干，我就想练字。从《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下图：方昕与看管他的解放军战士）一个字开始，一笔一划那么写，一共抄了



四遍。白天练字，晚上那地方老没电，六点多钟以后只能黑着灯在屋里呆着。我们是三个人一个炕，经常那俩人轮流，一个人看着我，另一个就去别处聊天了。因为我是反革命，他们平常不跟我说话的，晚上我就一人躺在床上，想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和书，经常想着想着就哈哈大笑。时间长了，那个解放军就问我怎么回事，让我给他讲。我俩躺炕上，黑咕隆咚的谁也看不见谁，我在那儿闭着眼睛给他讲，能从晚上八点半讲到天亮。讲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讲《幽灵岛》、《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吓得他发抖，说：“哎呀，我从来没听过这么紧张的故事。”

这个小战士是安徽人，十四五岁就入伍了，小学上过两年，大概隐瞒岁数就参军了。那时候，当兵就是逃脱苦海，起码可以吃个饱饭。后来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熟了，他就给我讲他自己的经历，正是在这段时间，我知道了很多很多外面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1959、60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安徽是重灾区，死人非常厉害。这个小战士说，

在他们村，从老到少一姓死绝了的有好几户。那时候，城里人一般是24斤的定量，老头儿、老太太是21斤，像我们大学生一个月有34斤，就是说，一天可以吃一斤，然后还有四斤的“机动粮”，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定量了。但他们的定量有多少？八斤。这还是名义上的，不是说磨出来的面，或者玉米豆，而是带骨头的玉米，八斤。老百姓怎么活呢？那时候不让随便离开，饿死也得在村里，但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实在没办法就出去要饭，要到哪儿算哪儿，最后给抓回来，然后再走。

他们那儿出过这么一档子事。有个复员军人，大概是连级干部，春节前后回家探亲。他从县里下了车，但回去还有一段路，必须得走着。到一个村，已经很晚了，他也走不动了，就想在村头借宿。这家是个寡妇，带着一个小孩儿，开始不让他进，说不方便。后来他就使劲说，说自己是解放军，而且也不进大屋，就在柴房里蹲一夜。并且他还带着吃的，有挂面、白糖、猪油，可以一块儿吃。你想，那都是饿得快半死的人，一听说有吃的，就这么让他进来了。结果，这女的起了歹心，愣把这解放军给弄死了，不仅把他带的东西留下，连人都给卸了块儿，搁在腌咸菜的缸里，就那么腌着，吃。然后跟她儿子说，这是吃豆腐。

后来，这个解放军家里说，怎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于是就报了案，但一直没查出来，等于这人就失踪了。事情怎么败露的呢？因为那个小孩儿。有了吃的以后他长劲儿，过去大概老挨欺负，但是那次把队干部的孩子给打了。人家回去以后，跟他爸爸哭，他爸爸说：“他那么瘦小干枯，怎么打的过你？”于是给拽到大队部来，果然，毕竟吃了跟不吃就是不一样，就问他吃了什么。他说：“我妈给我吃豆腐。”豆腐？过去一看，还有半条腿在他妈缸里腌着呢。这是真人真事。

那个小战士还跟我说他们家的事，他们家有爷爷、爸爸、妈妈和一个姐姐。那年他整六岁，过春节前在街上玩儿，看人家小孩儿穿老虎头的鞋，他就回家吵着要。因为他是独苗，他爸爸就责成他妈妈和他姐姐赶快做，他在那儿哭，他爸爸在那儿嚷嚷，说：“快点儿、快点儿！”家里乱哄哄的。正这时候，外面有人叫，说是要开会，全家都得去，结果屋里没听见。什么会呢？他们村里养的一口猪丢了，要查这事。他们家没去开会，嫌疑最大，连夜就把他爸爸五花大绑拉到队部，吊房梁上就打。从初一吊到初五，猪找到了，把他爸爸放回来，到家就吐血，到

了年十五，又被派去修河工，最后就死在河滩上了。后来他妈妈带着他姐姐改嫁，剩下爷爷和他。那时候他爷爷才五十多岁，经常趁着人不在，偷偷钻到湖里摸鱼给他吃。

这个小战士什么都跟我说，所以来我俩特别好。每次斗我，黄指导员是领头的，旁边还有两个审的，其他都是积极分子，跟着吆喝，喊口号。像这种会，根本没有法律程序，而且我也没有定案，所以来我明白了：他打你什么的，其实都是给你施加心理压力。我小时候特别爱哭，一讲故事先自己哭了，所以给别人的印象：方昕最软弱、最胆小、最窝囊。运动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学都说：“方昕应该是第一个投降，第一个交代的。”哎，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了，就他不承认，那就帮助帮助吧。每次斗的时候，十几个人围一圈，平地上放一个小板凳，特别矮，我就跟坐地上差不多。他说你的时候，你还得仰头看着，那姿势别提多难受了。每天都这么斗，常常一拳打过来，我整个人都折过去了。别人都站那儿抽烟、嚷嚷，这个安徽小兵每次就站我后头，起码能用腿垫一下，不至于让我一头撞到后墙上。

斗的时候，经常是突然开十天的会，完后就半个月、一个月都不理你，然后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又来一次。但我每次都没承认，最多就是：“我在文化革命中有错误，我自己的觉悟不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不够，我认真检讨。革命群众对我的教育非常好，都是应该的，我相信党组织，我的问题能搞清楚……”梆——，一拳打过来，说：“你还以为没搞清楚啊？告诉你，我们根本就没打算从你手里要什么材料。你的事我们早清楚了，现在就是给你个机会挽救你。”那十几个人就哈哈大笑。

有一次开会，我刚要说“相信党、相信群众”，一下被打住了，说：“你也甭废话了，今天我们就是来看看你的态度。问你个最简单的问题，冲京西宾馆是怎么回事。”1967年7月，武汉发生了一件“百万雄师”的大案，是轰动全国的一个大事情。当时武汉的保守派叫做“百万雄师”，那是一个巨大的组织，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是支持的。因为两派打得厉害，“中央文革”派王力去，结果“百万雄师”把他给包围了，这就成了一个反革命事件，最后被宣布是反动组织。后来中央在京西宾馆开会，就在军博那边，“中央文革”组织人到京西宾馆去抓陈再道，给中央施加压力。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周恩来，现在知道，实际上江青这些

人是利用红卫兵，给周恩来施加压力。那一次，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有人冲进去，中央音乐学院没冲进去。因为周总理正在里面开会，如果说陈再道拿着枪抵抗，我们冲进去是革命的，死了算烈士，但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冲进去干嘛？可到了抓“五一六”时候，这都是有理也讲不清的事情。

问我京西宾馆那次去了没有，我说：“去了，这我记得，但至于为什么要去，我忘了。好像是我骑一个自行车进音乐学院，门口大喇叭喊着要去京西宾馆，我就跟着一块儿走了。”那帮人哈哈大笑，因为别人有调查材料，他们都看过，就哈哈大笑，说：“你编，接着往下编，后来呢？你怎么去的？”那能怎么去，我们走着去的。哈——，他们又开始笑，说：“你再编，你到底怎么去的？”那能怎么去？……哦，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有个广播车，因为经常游行，金毓镇他们那些喜欢无线电的，做了一个电池带动的扩音器，搁在学校的一辆吉普车上。我说：“那我可能坐那个车来着。”那边说了：“这他妈是句实话，你这个头儿还能走着去？”那好那好，那我就坐车了。“车上有谁？”比较经常在车上带着喊口号的，有个危大苏。“还有谁？女的，女的。”他就提醒我。很久以后，我跟我爱人提起这件事儿，她说，当时她在车上。哈哈，我是忘得一干二净，看来人家还是有根有据，“好嘛，是你女朋友，你就不交代，可见这人有多么不老实”。

后来我问那些承认过的人，在这么一个气场、这么一个氛围下，整天这么挨整，人真的会想：“是不是那天我参加了，我给忘了？”那真的是把人给整傻了。

一直就这样，两年多的时间，两个解放军看着我，每天就这么捱日子。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的工资已经发了，一个月是46块钱。在70年代，46块钱绝对够一家老少三代过一个月日子的，但我一个人在那儿关着，花得一分都不剩。因为只要开我会了，看我的兵头天晚上就跟我说，然后我拿五块钱，第二天他们一个人看着我，一个人到二十里外最近的集市上，买一包中华烟、一瓶洋河酒，还可以买一只烧鸡。连来带去四五个小时，中午吃完饭以后去，下午四五点钟回来，里边还在斗我，他就把东西先悄悄搁水缸里藏着。我听见外边门响，接着是水缸盖响，就知道是他回来了。等批斗完了，大队人马一走，我们仨人连抽中华烟，带喝洋河酒、吃烧鸡，所以我这每月46块钱不够花的。

一直关到1972年的七、八月份，突然有一天，那个吴主任，那是最高领导了，一年也见不到一次，突然他就来了，翘着个二郎腿、抽着烟，说：“怎么样

啊？每天干什么？”我说我每天学《毛选》。“交代问题怎么样了？”我说我还正在写。“你爸爸来了封信”，那时候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看见他带着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你爸爸来了封信，组织上考虑……这样吧，你回家看看。”等于“五一六”这事就完了，也甭说是、不是，也甭说怎么样，就完了——不然怎么解决呢？刑期也不存在，你要承认也好办，落实政策，但你又不承认，那怎么办？所以他说：“你先回家看看。”

我说：“太好了，但是……我没有路费。”没路费？不可能啊，每个月发你那46块钱哪儿去了？因为对于解放军来讲，那是养家糊口的一大笔钱，怎么会没有呢？像孙铁，关了他两年半，攒六百多，但我是一分钱没有。负责看我那小兵说：“他身体不好……”“这样吧，这笔钱组织上出了。”派一个兵，一直从天津葛沽把我送到农科院，我妈妈做了一顿中午饭，他吃完走人，我就算没事儿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说：“你这个‘五一六’……”直到1973年的四月通知我说分配，我又回农场呆了几天，这就算完了，哈哈哈。

十六

我们是1962年上的大学，本来应该1967年毕业，但是1973年的四月份才给分配工作。你想，从1966到73年，那得积累了多少届毕业生，那是一大批人呐，一下子都给解决了。因为我是音乐学院的头头儿，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不适合留京，应该离中央远点儿。而且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远分对儿，近分顺儿（指有对象的），不远不近分光棍儿”，所以就把我跟我爱人分到连云港，那是苏北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小城市，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文工团里。

1980年10月，我被调到东方歌舞团。起初，团里还比较认真的来搞这个乐队，所有舞蹈、唱歌都由乐队现场伴奏。指挥是个拉二胡的老人儿，水平有限，乐队快了、他跟着快，乐队慢了、他就跟着慢。那时候，“东方”有朱明瑛、郑绪岚、牟炫甫等等这些腕儿。像郑绪岚，以前就是个工人，后来阴差阳错成了腕儿。所以她到“东方”来就显得很谦卑，到乐队都是“谢谢各位老师”，特别客气。朱明瑛过去是个跳舞的，歌儿唱的不怎么样，但她是个“老东方”，脾气大，经常演出就在后台嚷嚷：“今天乐队怎么搞的，快的我都没法唱了！”有时候团长王昆就跟指挥说：“乐队你们怎么搞的，小朱又说你们太快了。”好好好，那我

们就慢点儿。但朱明瑛老这么天天骂，乐队这帮人也生气了，今天我们快点儿，嘀嘀嘀呆呆……你想，她是因为舞跳不好才改的唱歌，换气本来就不大利落，结果快的她倒不过气儿来。太快了、太快了，确实太快了，那就慢点儿，慢点儿，嘀，嘀，嘀，呆，呆，能多慢多慢，哈哈哈……

1986年以前，基本还是乐队伴奏，但随着录音技术的提高，先是舞蹈不用乐队了，（下图：1973年4月，离开农场前的最后一次合影）有些地方根本连乐池都



没有，直接放录音就完了。没过多久，唱歌的也可以用伴奏带，最后连乐队都能放录音，我们只是在上面做样子。大家拿着乐器上去，还化妆，然后假模假

式在那儿晃，一演几百场。这回倒好，连音儿都不用对了。“东方”前前后后有过五六个贝司，但是舞台上永远只需要一个，而且经常就用不着，所以有些人就改了行，最后我是多少年都没拉过贝司。

“东方”第一批的舞蹈演员是从学东方舞开始启蒙，在外行眼里，舞蹈不就是伸胳膊伸腿、换换服装？什么欧洲的、非洲的，黑人的、白人的，古典的、现代的，只要有钱把服装做出来，不就完了么？其实从严格来讲，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那舞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东方”的出现。比如阿拉伯的肚皮舞，那跟所有舞蹈的范儿都不一样，等我们到那个国家去，人家说：

“这个舞蹈，你们不要跳了，我们中学生都比你们跳的好。”一看就是外国人在那儿瞎扭，差太远了。我们团有一个巴基斯坦的男子舞蹈，很漂亮、很帅，我到团里的头几年，场场都看这舞蹈。后来我们到巴基斯坦，看他们当地人跳，那种活、那种灵。哎呀，相比之下，我们那就跟男子集训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王昆是东方歌舞团的人，从它1962年成立，到她退休，所以她对“东方”

的来龙去脉、艺术方向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王昆退下来以后，接任的第一把手离“东方”越来越远，一任、二任、三任，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就能来当团长。现在改叫“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动静儿非常大，什么都干，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全文完)

【資料】

吳法宪 1971年4月9日的检讨

主 席：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林副主席，干扰了九届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离了党的“九大”路线。由于我的错误，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每当想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沉痛。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最深刻的教训。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主席多次亲切关怀，谆谆教导，严格批评和耐心教育下，在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同志多次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下，经过反复学习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和主席、林副主席最近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批示，特别是学习了主席对我检讨的批示，和主席对军委座谈会的批示，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逐步提高了认识。深深感到，主席一系列的教导和批示，完全打中了我错误的要害。越学，越感到主席的教导无比温暖，是在政治上对我最大的爱护，最深刻的教育，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去年十月向主席写的检讨，就事论事，强调客观原因多，觉悟实在太低。因此，再次向主席诚恳检讨认错。我一定带着犯错误的沉痛教训，把主席的批示作为我一生思想革命化的指针，经常学，反复学，并通过实践，改造自己，坚决改正错误。

一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所犯的错误。

一、去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康生同志召开宪法工作小组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

在那次会议上，对宪法的写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这个问题本来是提供讨论的，是正常的。由于我平时对张春桥同志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春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反感，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

就更加激动，自以为是，非常主观，错误地顶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
(下图：吴法宪在天安门上)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



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还极其错误地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就主观片面地给张春桥同志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 very 紧张。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我还错误地认为是讲对了。在会中休息时，我离开了会场，用电话把我主观片面的错误意见，

报告了黄永胜同志。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

八月十三日那次会，由下午三时半一直讨论到下半夜一时半左右才结束。这次会，陈伯达也参加了，中间他溜走了，到我发言快结束时才回来。散会后，在怀仁堂门口，他问我今天发言为什么这样激动，当我要给他讲的时候，他说这里不好谈，要我到他家里去谈一下。于是，分别坐车到了他家里。在他办公室，我就把会议情况和发言的内容告诉了他。陈伯达洋洋得意，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吹捧我“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就用陈伯达家里的电话把我的错误看法报告了总理(当时未向总理说明是在陈伯达家里打的电话)。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的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我没有向主持宪法工作小组会议的康生同志请示，也没有弄清情况，就匆忙地向总理、永胜、叶群同志反映。尤其严重的是，没有把陈伯达乘机挑拨、吹捧的话，向总理、康生、永胜、叶群同志报告，直到去年十月十八日，总理、康生同志找我们谈话时，我才作了交代。

八月十四日晚，在政治局会上，我又重复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康生同志当即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我对康

生同志的批评，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表现对康生同志极不尊重。

我在八月十三日会上和会后的这些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从此陷进了陈伯达的圈套，种下了犯错误的种子，也对不起张春桥同志，我已向张春桥同志认错道歉。由于我主观武断地反映了错误的情况，影响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同志在庐山犯方向、路线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二、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地进行挑拨和煽动。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后，他来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这次谈话，主要是攻击和污蔑张春桥同志，煽动性很大。陈伯达谈了一九六七年处理安亭事件和上海夺权的经过，说是他派张春桥同志去处理安亭事件的。他说当时情况很紧张，陈丕显要找他讲电话，他就不接，后来张春桥同志给他打电话，他就接了。说他是支持张春桥同志，不支持陈丕显的。是他写了几条办法，由张春桥同志宣布，才解决问题的。然后又在上海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讲话的内容也是由他打电话告诉张春桥同志的，结果大会开好了，夺权成功了。以此吹嘘他自己，贬低别人。他还攻击张春桥同志既没有读多少书，写什么文章，还好表现自己。他还谈到关于“天才”问题，我们就问他有没有马、恩、列、斯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他说有，回去查查书，给你们找一些。他回去后，过了一段时间打电话传给我七条（第一次三条，第二次两条，第三次两条），在电话上我同他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交给秘书打印了几份，第二天给了作鹏、会作、叶群同志。但是没有给李德生同志，在这里也表现出一种宗派情绪。事后看来，陈伯达这次找我们谈话，主要是利用我们对“天才”问题的无知和对张春桥同志的错误情绪，挑动我们在会上为他发起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欺骗同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充当帮凶。这次陈伯达对我们说的一些黑话，我都听进去了，当时既没有顶回去，又没有向组织报告，还把陈伯达搞的那个材料给了作鹏、会作和叶群同志。这是违犯党纪的非法活动，是犯罪的行为。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在九届二中全会西南小组会上的发言是极其错误的。一是把我在八月十三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极端错误的看法进行了传播，虽然没有指名，但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了张春桥同志。二是引用了陈伯达搞的那份断章取义的材料。在我的发言煽动下，造成西南组同志的思想混乱，影响了会议的正常进行，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搞突然袭击、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起了煽风点火，积极

支持的极坏作用。

八月二十六日黄昏，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谈谈。我们到他那里以后，他说主席看了他二十四日在华北组的发言稿，严格地批评了他。后来他又到康生同志和江青同志那里，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我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吞吞吐吐的不肯说，只说以后再不同我们来往了。我们三人当时都回答说，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教育，批评什么我们都接受，坚决改正。当时陈伯达说话神态异常，吱吱唔唔，对主席的批评毫无沉痛的心情，没有一点悔改的表示，我们当即要他把找我们谈话的情况报告总理。在那里呆了一会就回来了。事后分析，他这次找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再骗我们一次，以挽救他自己。

总之，我违背了主席的教导，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站到陈伯达反“九大”路线一边，给陈伯达当了帮凶和义务宣传员。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毫无正大光明的气概，欺骗了许多同志，做了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的大坏事，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内心深受责备，十分悔恨，永远也不能忘记。

三、今年二月的军委座谈会，我本应对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清理思想，教育自己，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同时，通过自我检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陈伯达，认清他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的本质。但我没有这样做。在二月十九日传达主席批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又没有进行检查，失去了两次极好的自我教育机会，一错再错，造成被动，心情更加沉重。这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患得患失，怕揭怕批，因而几次都不能争取主动。

四、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

二

犯错误的原因。

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陈伯达、惯用特务手段，用谣言和诡辩欺骗人，

毒害人，其险恶用心，实在狠毒。但是骗人是一回事，受骗又是一回事，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之所以掉进陈伯达的泥坑，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一、同陈伯达有共鸣之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陈伯达没有接触过，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才开始有所接触。过去认为他虽然组织能力很差，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但觉得他“读的书多”“懂理论”“会写文章”，迷信他，相信他。

在对张春桥同志有意见这个问题上，我同陈伯达在思想上共鸣。去年八月十三日会议上，陈伯达利用我的错误言论进行挑拨，我却把他的别有用心，看成是对我的支持。因此，八月二十三日他在庐山散布攻击和污蔑张春桥同志的黑话，我就听进去了。

自己一向不读马、列的书，也不懂马列。对于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个根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相信陈伯达的所谓“天才论”。对他搞的那个材料，不分析，不鉴别，如获至宝，予以传播，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同志。

由于思想上有共鸣之处，我还毫无原则地吹捧过陈伯达是什么“穷秀才”、“老夫子”、“理论家”，等等。被他伪君子，假谦虚所迷惑，对他装出的一付可怜相表示同情。对领导上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不负责任，却又常发牢骚，说他没有多少工作，要求下放等错误言行，听之任之，没有进行任何斗争。

主席在“九大”前期曾经对陈伯达进行过极为严厉的批评，中央其他同志在会上也批评过他，但是由于自己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政治上缺乏敏锐性，对主席给他的批评，没有深入思考，只认为他是政治上一个时期犯有错误，没有警惕他是三十多年来一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学习了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才使我恍然大悟，但是已经后悔莫及。

二、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我这次犯错误，是由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决定的。在八月十三日的那次会上，我凭着主观武断的感觉，不

调查，不研究，不和张春桥同志谈心，不弄清情况，不加分析，就随意下结论、扣帽子，匆忙上报。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西南小组会上，又把这些主观片面的错误意见，传播扩散。这完全违背主席的教导。

三、骄傲自满，尾巴翘上了天。“九大”当上了中央委员，自以为得意，锋芒毕露，忘乎所以。唯我独尊，好象只有自己最革命，最热爱毛主席。本来自己水平很低，却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对有的同志的一些不同意见，听不进去，动不动就无限上纲。由于骄傲自满，在团结问题上，不顾大局，总理曾经给打过招呼，同张春桥同志要搞好团结，我没有听进去。无组织、无纪律，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对这样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就拿到小组会上去讲，完全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

喜欢吹捧，不仅喜欢人家吹捧自己，自己也喜欢吹捧别人。除了吹捧过陈伯达外，也曾不适当当地吹捧过一些别的同志。

四、我所以犯这样大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联系自己的实际，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也没有读马、列的书。没有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没有把“九大”团结胜利的号召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陈伯达一挑一捧就上了劲，把“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头脑中占了上风。完全忘记了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要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要心血来潮就忘乎所以”的教导，忘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忘记了“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不听主席的话，反而听信了政治骗子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不忠。

三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在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的指引下、在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的面目，清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通过半年来的学习，又看了陈伯达的大量罪行材料，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疯狂反党乱军，挑动武斗，这次又挑动我们为他反革命阴谋服务，都是由此而来。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一场保卫主席，保卫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保卫“九大”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这场斗争中，我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钻进了陈伯达的圈套，掉在陈伯达的泥坑内，犯了背离“九大”路线，破坏党的团结的罪行。在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保证今后一定坚决改正错误。

一、遵照主席“批陈整风”的指示，带着对陈伯达刻骨的阶级仇恨，坚决批判叛徒、特务、老反共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认清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和危害，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同他彻底划清界线，肃清其流毒。

二、一定牢记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反对主观主义，加强调查研究，尊重客观，尊重实践，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向上反映情况一定真实准确，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认真吸取这次犯错误的教训，坚决克服头脑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三、坚决克服骄傲自满和宗派主义情绪。这次犯了严重错误，才使我真正懂得，骄傲自满是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敌，是团结的大敌，如不彻底克服，还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今后一定遵照主席“力戒骄傲”的指示，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同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坚决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五湖四海的同志共同革命。

四、加强党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和统一。一言一行努力做到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识大体、顾大局，大事小事注意请示报告，一切行动听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号令。

五、遵照主席“认真看书学习”的指示带着自己犯严重错误的教训，刻苦学

习主席著作，认真读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

我一定牢记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深刻记取这次最沉痛的教训，把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变成自己实际的行动，永远跟着伟大导师毛主席继续革命。

以上检查，恳请主席批评指示。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吴 法 宪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

【资料来源：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翻印，1972年7月】（余汝信提供）

【資料】

最近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以下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最后还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动态报

第 009 号 第一版 1967 年 3 月 24 日

【资料来源：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第三动态组组长”张树有提供。】

(张树有注：这张小报系本人整理所存文革资料时发现。)

【資料】

总理在工代会后对蒯大富同志的个别谈话

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批判不得，要么就要打倒。否定一切不好，肯定一切也不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可批，一批就打倒都不对。打倒余秋里为时过早，我看没有什么新材料，批评肯定有权力，余秋里和谭震林的性质不一样。不要以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能批评，说明你们红代会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红旗》第四、五期社论说是两条路线的作战，对群众和群众的干部，否定一切是不对的，对干部来说，肯定一切都是错误的，不要形《左》实右。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原封不动的搬上去，就叫复辟。对于谭震林同志还要揭露批判。他的性质以后再定。毛主席对刘少奇看了二十年，等了二十年才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对谭震林的批评要深刻他才能服。不能光贴大标语搞声势。你们光贴大标语造声势要是小学生才可以，大学生就水平不高了。老搞一些轰动，所以外国人评论，政局不稳。轰动不能触及灵魂。《红旗》第四期社论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后一段是主席加的，我想都没有想到，主席真是宽宏。工厂学毛选，不能占用生产的八个小时。在外地调查必须通过谢副总理批准，让余秋里和谷牧在小会上检查，才能触及灵魂。65年毕业生要回去，不能留在学校里搞斗、批、改，对斗、批、改有什么意见可以留下来吆。毕业生问题，两个月以后中央才能出个文件，毕业分配自己报，大家评。

-----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动态报

第011号 第六版 1967年3月29日

【资料来源：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第三动态组组长”张树有提供。】

(张树有注：这张小报系本人整理所存文革资料时发现。)

【資料】

湖南土改（二）

任冬林整理

按：84期刊登了任冬林先生搜集整理的湖南土改（一）。本期刊登（二），以后还将继续刊载（三）、（四）等。近年来，学界对土改的研究较前有大的突破。如盛洪在《为什么要研究土地制度》一文中谈到：“土改据说是为了改变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的现象，革除几十年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然而，又有大量土地史研究（如赵冈和陈仲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明、清、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的土地分配相当平均，即使在土改时期，当代研究者的数据表明，土地集中度远在土改推行者的估计之下。”“有研究者（如高王凌）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实际地租，要明显低于合约地租，甚至在地主与佃农的冲突中，官府更多倾向于佃农，这又使得‘地主剥削农民’的判断（土地改革的主要依据之一）需要重新审视。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租佃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成千上万个租佃交易形成的市场地租率是有价值的价格信号，能够引导人们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市场关系在近代以来遭到抨击和否定？再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许多佃农不遵守签订租佃合约时的交租承诺？这显然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南方周末》2012年5月31日第31版）。看一看当时对土改的宣传，相信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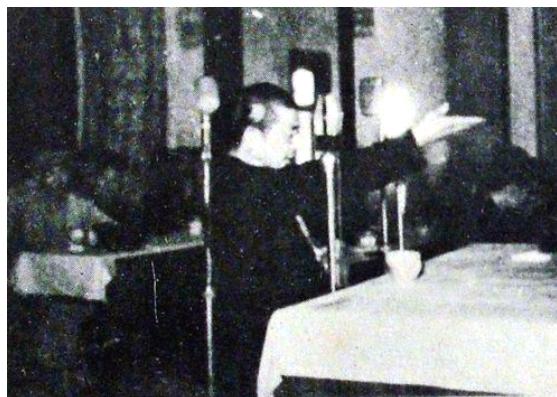
爲了積極準備土地改革，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共湖南省委
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召開了全省第一屆農民代表會議。

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在大会上致词。他着重指出：必须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巩固和壮大农民队伍，组织和

健全各
级农
会，以
便有组
织、有
领导、
有计划
地进行
土地改
革。



出席这次会议的农民代表有八百多人，这是会场的摄影。



农民代表孔福生在会上讲话，表示热烈拥护土改。

代表们一致举手通过“湖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在这次会议上，湖南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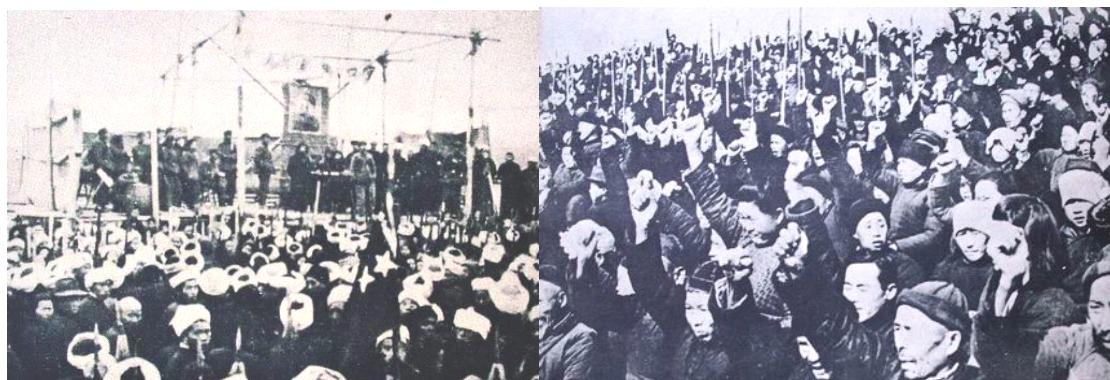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十月，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着重討論了土地改革問題。全體出席代表一致擁護土地改革的決議。

共產黨和人民政
府派幹部下鄉領導
農民實行土地改革。
幹部進入土改鄉，
召開羣衆大會，說
明來意，宣傳土改，
初步了解與研究、
分析情況後，分組
深入到戶，訪貧問
苦，扎根串連。



一九五〇年七月，湖南土改开始。人民政府训练了大批干部下乡工作。



岳阳筻口乡土改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解土地改革法和惩治不法地主条例。

湖南省岳阳县永和乡农民斗争恶霸地主时，高呼：“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农民当家作主。”



郴

县城东乡土改干部与贫农李孝良一面吃饭，一面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干部与李孝良的母亲一起劳动。祁阳洪桥乡雇农彭美石，在干部初次访问时，顾虑很大，不敢与干部接近。在干部的启发教育下，彭美石解除了思想顾虑，将自己的苦楚和当地的情况告诉干部。

經過個別串連，全家發動，把大部分貧雇農組織到貧雇農小組裏，進行訴苦挖根的自我教育，召開貧雇農代表會，由羣衆討論確定鬥爭綱領和鬥爭對象，選出領導鬥爭的核心和辦事機關——貧雇農主席團，並緊密地團結中農，積極準備反霸初戰。

經過個別串連，全家發動，把大部分貧雇農組織到貧雇農小組裏，進行訴苦挖根的自我教育，召開貧雇農代表會，由羣衆討論確定鬥爭綱領和鬥爭對象，選出領導鬥爭的核心和辦事機關——貧雇農主席團，並緊密地團結中農，積極準備反霸初戰。



贫农李孝良正在串联知心朋友。



贫雇农展开了自我教育的诉苦运动。这是常德肖伍铺乡刘老婆婆在小组会上，哭诉她儿子被恶霸地主张寿山害死的血仇。

湖南省湘潭县七区贫农胡少云和廖玉贵，这两位年过七十双目失明的老人，怀着满腔的仇恨，前去参加斗争会。



岳阳麻塘乡贫农易张氏在斗争大会上，理直气壮的向恶霸地主杜心田进行说理斗争。

人民法庭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宁乡三区农民将死心顽抗的恶霸地主刘雪奇押交人民法庭审判。



慈利环二保贫雇农积极分子串联发动中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平江六区八乡的农会横匾，今天又高高地挂起来了。

**通過貧雇農會、
農民代表會、羣衆
會，把劃階級的政
策交代給羣衆，經
過醞釀討論，結合
訴苦挖根，便進行
劃階級鬥爭。**



长沙花园乡土改干部，在贫雇农会议上讲解划阶级的政策。



划阶级时，地主百般狡辩。这是长沙花桥乡农民在划阶级的斗争会上，拿着地主的收租簿跟他算剥削账。

【来信选登】**1、黄葛云谈84期余汝信等人的文章：**

《记忆》84期余汝信、启之、沈迈克等几篇都相当好。美中不足的是校对不够严，如余汝信文中有一处把“造反派”错写成了“选反派”；启之文中有一处把“林彪”写成了“林虎”，把“新民主主义”写成“新民主义”（少一“主”字，至少有两处）；还有目录中任冬林一篇的副题多了几个字，成了“野蛮的地主阶级湖南土改”，读之令人诧异，一看内文才知是多了“湖南土改”几个字。

余汝信文章以大量史料详细介绍了当年中央文革记者的活动情况，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所引资料及分析都很重要。其中提到四川刘结挺、张西挺时，有一点不够准确，说“夫妻俩于1970年8月倒台”，实际上刘张夫妻俩倒台是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的“一二·二五”批示（当时都称是毛主席的批示，但至今未能看到毛到底是具体怎么批的），这个批示即宣告了他们政治生命的终结，尽管此后还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在台上做检讨之类的过渡，实际上四川党政军民都知道刘张倒了，当年的“一二·二五”批示是四川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在此一年多以前的1968年3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中，曾严厉斥责“打倒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上纲之高让四川任何想打倒刘张的人（包括军队）都不得不作检讨转弯子，以示对毛的忠心。然而这同一个中央，说变就变，短短一年多之后就在1969年底说四川落后的根源在刘张身上了。随后，1970年2月开始举办的中央学习班上就全川大小头目一边倒地全面揭发刘张问题了。因有中央批示在上，没有谁敢再为刘张辩护。再激进的造反派（曾经高喊“刘张坐牢我坐牢，刘张杀头我杀头”）也得“与中央保持一致”，纷纷反戈一击揭发批判刘张这两个“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至于所谓1970年8月中央宣布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据梁兴初在林彪事件后于1972年7月15日就与林彪的关系所作的检查交代中说，是他不经军区党委和省委，自己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擅自宣布”的。（载《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六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2、印红标、吴晞、范建国、郑广斌等人谈84期余汝信文

一、余汝信关于中央文革情报系统的文章，对了解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资讯来源和内容很重要。余文为研究文革初高层的政治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史料。

二、希望余汝信与《记忆》进一步合作，将他手中的《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做一整理，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作为史料在《记忆》上的刊发。以泽及同仁，推动文革研究。

3、阎长贵指出方昕口述中的两处误记：

84期所登《方昕口述》中说：刘少奇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和毛泽东支持上海成立人民公社，记忆有误。我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中说过，这句话“陶铸在1966年7月30日的讲话中有明确交代。这一天，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科学院讲话。陶铸说：“我这个宣传部长才当了一个多月，还不到两个月。我这个人是不能当宣传部长的。但现在没有办法，只能当下去了。文化革命我没有搞过，‘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这句话，很有启发。我不能算老革命，可算是中革命（陈伯达插话：‘你是很老的革命，有四十多年了’），搞过大革命、土改、游击战、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就是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懂得怎么搞。”不容置疑，陶铸说的是实情，即实际情况。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一个中学生讲的。这位中学生是谁？陶铸没说，我们不得而知。”（《问史求信集》）。

关于毛泽东支持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说法，我在《毛泽东不赞成上海人民公社》一文中，有过叙述：“……张春桥、姚文元2月12日到北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12~18日），毛主席三次接见他们，就“公社”问题，毛主席也可能说了自己“考虑不周”，其主要内容，张春桥在上海的群众大会上是这样传达的：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许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问史求信集》）

